

各位代表，大家好！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渤海之滨的美丽城市 -- 天津，参加第八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以下几点温馨提示，供代表们参考：

- 报到当天的晚餐由会议组织方负责。参加学会理事会议的代表在假日酒店二层就餐、三层开会；其他代表在水游城附一楼凭券就餐。
- 会议地点在天津商业大学图书馆，入住天津水游城假日酒店和如家酒店（西站店）的代表 22 日和 23 日早上 8 点在假日酒店门口集合，有大巴车送代表至会场。
- 会场有电脑和投影仪供代表宣读论文时使用。
- 23 日晚在天津食品街狗不理大酒店举行欢送晚宴，之后自由活动（可以购物，该饭店距离入住酒店打车 10 元左右，距天津站打车 11-15 元，距天津西站打车 11-15 元，距天津机场打车 50-60 元）。
- 天津早晚温度介于 16°-26° 之间，请各位代表适当增减衣服。
- 大家有什么事情可随时与会务组联系。
电话：18622080979 （赵芃老师）、13702099432 （郭松老师）

祝大家在天津期间生活愉快！祝研讨会圆满成功！

第八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

会议日程安排

9月21日 20:00 学会理事会议 地点：假日酒店三层会议室。
 主持人：中国社会语言学会会长 郭熙教授

9月22日 9:00 大会开幕式 地点：天津商业大学图书馆三层报告厅
 主持人：天津商业大学 田海龙教授
 9:30 照相、茶歇
 10:00-11:00 主题报告：汉语词语书写形式的革新——谈谈字母词的身份与规范
 报告人：中国社会科学院 江蓝生教授
 主持人：商务印书馆 周洪波教授
 11:00-12:00 主题报告：社会语言生活与字母词
 报告人：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陈章太教授
 主持人：商务印书馆 周洪波教授
 12:20 午餐 瑞德厦餐厅
 13:30 - 17:00 小组发言(15:00 --15:30 茶歇)，地点：天津商业大学图书馆二层、三层
 17:30 欢迎晚宴
 19:30 欣赏相声表演/游海河

9月23日 8:30 - 12:00 小组发言 (10:00-10:30 茶歇)，地点：天津商业大学图书馆二层、三层
 12:20 午餐 瑞德厦餐厅
 14:00-14:50 主题报告：语言秩序与语言市场：少数民族地区汉族学生的语言价值观和语言使用变迁
 报告人：美国马里兰大学 周明朗教授
 主持人：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苏金智教授
 14:50-15:40 主题报告：

报告人：北京语言大学 李宇明教授

主持人：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苏金智教授

15:40-16:30 主题报告：少数民族语言在市场经济中的机遇与挑战

报告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周庆生教授

主持人：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苏金智教授

16:30-17:00 茶歇

17:00-18:00 “中国社会语言学会青年学者优秀论文奖” 颁奖及闭幕

式

主持人：北京大学 高一虹教授

18:30 欢送晚宴（狗不理大酒店）

主题报告

汉语词语书写形式的革新 ——谈谈字母词的身份与规范

中国社会科学院 江蓝生

在汉语词汇史上无论是内部自主创新还是向外借用，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汉字体系一直是汉语词语唯一的书写形式，这种局面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开始被打破。

本文说明字母词产生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列举了字母词的类型，认为中西合璧式字母词可以看作汉语词汇系统中特殊的一类，而纯由西文缩略而成的字母词目前还不能算作汉语词。

文中说明了字母词的长处和短处，介绍了《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对字母词的规范处理。并针对某些人所谓收录字母词的思想根源是“汉字落后论”，“为什么汉语借用英语时用英文字母，而英语借用汉语词汇时不使用汉字？”“300年后汉字还会存在吗？”以及“先翻译后吸收”等观点和质询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最后指出这次争论的焦点是双方的语言规范观不同，举报组织者打出的旗子是“捍卫汉语的纯洁性”，并不惜提高到法律和政治的层面，而我们认为这个口号不科学，不应该把它绝对化、极端化。对待进入汉语的字母词我们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在应用中吸收适用的，淘汰不适用的。“纯语主义者”用片面的极端的思想去误导群众或有关领导，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影响社会语言生活的和谐。

结束语：“保卫语言的纯洁性”的口号不科学，我们主张树立科学的语言文字规范观，用“促进祖国语言文字的正确使用和健康发展”来替代它。我们不能禁止字母词的使用，而是应该科学地引导它有序、规范地使用，我们所反对的是字母词的乱用和滥用。现代语文词典有选择地收录字母词是它的定位和功能所决定的，职责所在，无可非议，应该做得更好。

社会语言生活与字母词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陈章太

一、字母词的产生与发展。

1. 字母词的出现是社会语言生活变化发展的结果，是语言进化的重要体现。
2. 有些字母词已进入中国的社会生活，并融入汉语乃至少数民族语言的语言生活中，在语言交际中发挥不小的作用。
3. 字母词的进入不会也不可能影响汉语的健康发展，有人对此有不同看法，并忧心忡忡，这没有必要。

二、关于《现代汉语词典》与字母词的讨论。

1. 最近关于《现汉》收录“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是否违法的热议，引起了有关领导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2. 《现汉》第6版收录字母词，贯以“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栏目附在正文后面逐条详注，这既贯彻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有关规定，又反映了社会语言生活的变化发展，方便读者查阅，是语文工具书的一种进步，完全与“违法”无关。
3. 《现汉》对字母词的处理，具体体现了科学性、严谨性、规范性和实用性特点，这是值得称道的。

三、字母词与现代汉语规范化。

1. 现代汉语对外来词语有很大的包容、净化能力，而社会语言生活也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对字母词及其使用，也会遵循社会约定性去调节。
2. 对字母词及其使用要进行必要的引导与规范，总的原则应是“顺乎自然，因势利导，监测规范”。
3. 对字母词进行规范是否恰当，主要取决于遵循什么样的语言观，是坚持变革创新的语言规范观，还是固守守旧因循的语言纯洁论。
4. 对字母词的认识与规范，还涉及深层次的文化、观念、心理、习俗等因素。

四、普及语言学和语言规范化等知识。

这次字母词讨论显现，需要广泛普及语言政策法规、语言学、语言文字应用和语言规范化以及相关的知识。

Language order and linguistic market: Han Students' Changing value orientations and language use in Minority Communities

Minglang Zhou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mlzhou@umd.edu

This talk examines how China's economic reform and gradually-globalized economy have changed its language order and linguistic markets in the last three decades and how these changes have affected Han students' value orientations and language use in minority communities in China.

Language order is an institutionalized hierarchy of two or more languages in a community, a nation, and/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Zhou 2009). Depending on the resources a language enjoys in this hierarchy, languages may be classified as super, regional, and local (see Fishman 1998/1999). Generally speaking, the higher rank a language possesses the more valuable that language is. However, for speakers of a language or multiple languages, they may realize the value of that language or languages only in a linguistic market where a linguistic competence may become a linguistic capital or commodity for sale (see Bourdieu 1991). They may choose to participate in a market when choices are available or may be forced to participate in a market when choices are not available.

This talk defines four levels of the linguistic market and studies their stability and instability. It examines the interaction of material and non-material values of a linguistic capital in a linguistic market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material value orientations and non-material value orientations. Within this framework, the talk analyzes how, under the pressure of China's market-oriented economy and globalized economy, linguistic markets and speakers' value orientations have been evolving and how such changes have been shaping Han students' value orientations and language use in minority communities in multilingual China.

Selected English References:

- Bourdieu, Pierre. 1991. *Language and Power*, introduced by J. B. Thompson (ed.) trans. G. Raymond and M. Adams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Fishman, Joshua A. 1998/1999. The new linguistic order. *Foreign Policy*, 113, 26–38.
- Zhou, Minglang. 2009. Linguistic diversity and language harmony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nese Education & Society*, 41 (6): 3-9.

Selected Chinese References

- 周明朗 2009 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秩序：全球化与美中两国的多语（教育）战略 《暨南学报》（社科版）31 (1): 45—56。
- 周明朗 2009 全球化时代中国语言意识形态、语言秩序与语言和谐／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宣传司 编 《构建多语和谐的社会语言生活：民族语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民族出版社。

语言秩序与语言市场：少数民族地区汉族学生的语言价值观和语言使用变迁

周明朗
美国马里兰大学
mlzhou@umd.edu

本报告检讨过去30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语言秩序与语言市场的冲击，对少数民族地区汉族学生的语言价值观和语言使用的影响。

语言秩序是国际社会、国家或社区中多种语言之间制度化的等级关系（周2009）。视获得资源的多寡，语言可以分为超级语言、区域语言和地方语言（Fishman 1998/1999）。一般而言，语言的等级越高，就越具有价值。对说话人而言，首先要有可以把语言能力转化为语言资本或语言商品的语言市场，才有可能兑现语言的价值（见 Bourdieu 1991）。有选择时，说话人会选择合适的语言市场去兑现；没有选择时，说话人被迫进入现存的语言市场去兑现。

本报告确认语言市场的四个层次，即单个语言市场、大语言市场、国家语言市场和国际语言市场，分析这四个层次语言市场的稳定性问题。报告进一步研究语言的物质价值和非物质价值，提出相应的语言的物质价值观和语言的非物质价值观。以这个理念为基础，以少数民族地区汉族学生为例，报告分析三十年来语言市场和语言价值观在经济改革和全球化的压力下所产生的演变，研究藏族和维族地区汉族学生的语言价值观和语言使用的变迁。

Selected English References/部分英文参考书目：

- Bourdieu, Pierre. 1991. *Language and Power*, introduced by J. B. Thompson (ed.)
trans. G. Raymond and M. Adams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Fishman, Joshua A. 1998/1999. The new linguistic order. *Foreign Policy*, 113, 26–38.
- Zhou, Minglang. 2009. Linguistic diversity and language harmony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nese Education & Society, 41 (6): 3-9.

Selected Chinese References/部分中文参考书目

- 周明朗 2009 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秩序：全球化与美中两国的多语（教育）战略 《暨南学报》（社科版）31 (1): 45—56。
- 周明朗 2009 全球化时代中国语言意识形态、语言秩序与语言和谐／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宣传司 编 《构建多语和谐的社会语言生活：民族语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民族出版社。

少数民族语言在市场经济中的挑战与机遇

周庆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zhouqs@cass.org.cn

本报告旨在描述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社会发生重要转型的时期，所面临的五大挑战和五大机遇。

五大挑战是：少数民族语言社区缩小，市场竞争对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带来挑战，人口流动对朝鲜语言保持和双语教育形成冲击，高校分配制度改革对蒙古语言教育造成影响，境外势力的竞争和渗透。

五大机遇是：国家出台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新文件，国家推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规范化建设，政府组织抢救濒危语言，双语诉讼审判拉动对双语法官的需求，国际贸易催生跨境小语种热。

探讨制约少数民族语言发展的社会经济因素，展望少数民族语言发展趋势。

分组讨论日程

9月22下午

时间：13: 30—17: 00

组别：A1

地点：图书馆二楼

主持人：董洁、刘毅

主题：语言、身份、认同		
时间	作者	题目
13: 30 —14: 50	董洁	Mobility, voice, and symbolic restratification
	聂骅	Facing the World & Constructing the Self
	张天怡	中国家庭暴力受害女性通过网络发帖构建的身份认同
	黄文林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言语人特征刻画与身份鉴别
14: 50 —15: 20	茶歇	
15: 20 —17: 00	高一虹、颜静兰、陈建平、刘毅等	跨文化志愿者的语言态度、民族与国际身份认同
	史咫阳	大运会教师志愿者的语言态度调查
	赵玉超 陈建平	亚运会志愿者对不同英语变体的语言态度和交际态度调查
	刘毅 邓婷婷	大运志愿者的语言态度、民族与国际身份认同
	高一虹 林梦茜	奥运志愿者语言态度与文化认同面面观

9月22下午

时间：13: 30—17: 00

组别：A2

地点：图书馆三楼

主持人：陈非、王世凯

主题：语言规划与政策		
时间	作者	题目
13: 30 —14: 50	苏金智	海西经济区实施先行先试语言政策的战略意义
	李嘉郁	孔子学院与海外华文学校的整合与互补
	赵燕	从推普宣传口号看我国语言规划的特点与问题
	陈菲	国外语言教育政策对我国语言教育的启示
14: 50 —15: 20	茶歇	
15: 20 —17: 00	张梅	新疆区情与语言规划
	代秀兰	文化软实力提升需求下的英语旅游宣传语言规划研究
	张平	舆情视角下的汉语能力测试
	王英杰	美国五州语言路线图及对中国区域外语规划的启示
	王世凯	汉语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

9月22下午

时间：13: 30—17: 00

组别：A3

地点：图书馆二楼

主持人：牟岩、王卫兵

主题：语言使用		
时间	作者	题目
13: 30 —14: 50	周洪波	《现汉》字母词风波引发的思考
	冯学锋	当代中国语言年俗论
	牟岩 王南冰	2011：微博对语言生活的影响
	胡逸君	大学生使用字母词状况及态度调查
14: 50 —15: 20		茶歇
15: 20 —17: 00	武小军 王庆	交际空间与话语选择
	王春辉	城市化移民诸变量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曹德和	言语社区与言语共同体——试论 <i>Gemeinschaft</i> 在我国社会语言学中的两种翻译
	田莉	中介语变异研究综述
	王卫兵	同质有序说与异质有序说

9月22下午

时间：13: 30—17: 00

组别：A4

地点：图书馆三楼

主持人：张蕾、王梅

主题：话语分析		
时间	作者	题目
13: 30 —14: 50	崔艳英	语码转换与社会身份建构研究
	冯捷蕴	中澳媒体话语的跨文化对比研究
	孙雁雁	基于微博评论探讨政府微博对突发事件的报道策略
	张蕾	网络流行体的意向性解释
14: 50 —15: 20		茶歇
15: 20 —17: 00	赵一农	浅谈负面事件的命名
	黄英姗 陈春华	从李宇春电视访谈看转型时期我国性别文化下的女性形象
	陈星	A Diachronic Study on Chinese-English Code Switching
	张洋	新闻发言人个性化语言的传播价值
	王梅 夏慧言 傅钊	反语言的社会功能研究

9月22下午

时间：13: 30—17: 00

组别：A5

地点：图书馆三楼

主持人：康晓娟、王珊珊

主题：网络语言		
时间	作者	题目
13: 30 —14: 50	郭龙生	网络是语言创新的重要基地与助推器
	陈双双	小议淘宝体中“亲”字的泛化与影响
	胡安琪	网络流行语使用中的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差异研究
	康晓娟	从造词法看年度媒体新词语的戏谑风格
14: 50 —15: 20		茶歇
15: 20 —17: 00	汪磊	“XX哥”、“XX姐”流行及泛化的多层面分析
	刘楚群	网络调侃语简论
	潘红彦	QQ签名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李晓娜	英语外来词的语义和词形汉语化研究
	王珊珊 卢志鸿	浅析网络中式英语及其成因

9月22下午

时间：13: 30—17: 00

组别：A6

地点：图书馆三楼

主持人：高陆洋、边永卫

主题：语言与教育		
时间	作者	题目
13: 30 —14: 50	王玲	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的语言适应研究
	肖琳	谈公交站名的汉英翻译原则和技巧——以景德镇市为例
	郑梦娟 白杨	中英对外语言传播教师培养模式对比研究
	高陆洋	关注涉外婚姻家庭儿童语言问题,强化学研究和政府举措
14: 50 —15: 20		茶歇
15: 20 —17: 00	刘宏刚	家长投资与初中生英语学习动机_社会阶层视角
	许宏晨	A Quantitative Study of Chinese Tertiary Students' Self-concept of English and Bilingual Instruction Modes
	李艳红	美国双语教育政策：团体之竞争
	边永卫	大学高年级阶段英语学习动机的发展

9月22下午

时间：13: 30—17: 00

组别：A7（青学奖评选）

地点：图书馆二楼

主持人：

时间	作者	题目
13: 30 —14: 50	边永卫	大学高年级阶段英语学习动机的发展
	冯捷蕴	中澳媒体话语的跨文化对比研究
	赵芃	价格垄断话语的互语性分析
	戴红亮	2011年台湾语言文字热点及特点分析
14: 50 —15: 20		茶歇
15: 20 —17: 00	李昊平	中国环境话语六十年之变迁
	刘宏刚	家长投资与初中生英语学习动机_社会阶层视角
	和媛媛	多模态语篇中的框架和图形-背景结构——以对 Simmons 珠宝公司的一则广告分析为例
	曹晖 孟祥和 董晓芳	藏文网络新闻词语计量研究
	姚春林	藏汉双语社区藏语文使用及态度研究

9月23上午

时间：8:30—12:00

组别：B1

地点：图书馆二楼

主持人：夏历、佟秋妹

主题：城市 语言		
时间	作者	题目
8:30 —9:50	郭骏	关于城市语言调查的几点思考
	李伟	山西省都市语言使用状况调查研究
	毛力群	义乌城市双语建设现状及思考
	夏历	北京、南京、沈阳三个城市农民工语言状况对比研究
9:50 —10:20		茶歇
10:20 —12:00	陈立平	从双言到双语——常州市民城市化进程中的语码选择
	杨荣华	Language Choice and Identity Representation
	付义荣	回顾与反思：关于农民工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古力加娜提·艾乃吐拉	论城市化对民族地区生活语言的影响——以新疆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的语言使用情况为例
	佟秋妹	三峡移民的社会语言学个案考察摘要
	叶竹钧	对广州服务类职业口语现状的思考

9月23上午

时间：8:30—12:00

组别：B2

地点：图书馆二楼

主持人：王培光、赵冬梅

主题：语言使用		
时间	作者	题目
8:30 —9:50	王培光	香港雇员补偿判决书的语言使用
	陈立平 李建	spanglish 现象本质透视
	蔡丽青	教育培训咨询机构命名的用字情况调查
	郑宝珊	语言接触——以台湾华语「有+NP+在」与台湾闽南语「有+NP+伫咧」为例
9:50 —10:20		茶歇
10:20 —12:00	谢俊英	父母称谓变异实证研究
	高丽群 刘彬	-ling类单词中边音l兼做韵头与韵尾的发音方式的认知分析
	易明华	翻译中文化视点刍议
	张军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当代老年人称谓研究
	赵冬梅	汉韩亲属称谓语对比研究——以《红楼梦》及其韩文译本为中心

9月23上午

时间：8:30—12:00

组别：B3

地点：图书馆二楼

主持人：郭松、李昊平

主题：话语分析1		
时间	作者	题目
8:30 —9:50	祝晓宏	体育新闻报道里的一种指同表达
	王丹	广告性别隐喻：批评话语分析的视角
	钟小佩	政治隐喻与社会现实变奏
	郭松	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的隐喻研究
9:50 —10:20		茶歇
10:20 —12:00	丁素萍	在有声与无声的投射中识解作者身份
	和媛媛	多模态语篇中的框架和图形-背景结构——以对 Simmons 珠宝公司的一则广告分析为例
	李咸菊	军人身份构建的话语特征分析
	李昊平	中国环境话语六十年之变迁
	王家民	三十年来中国高校“复合型外语专业”建构的谱系学考察

9月23上午

时间：8:30—12:00

组别：B4

地点：图书馆三楼

主持人：张瀛月、戴红亮

主题：方言研究		
时间	作者	题目
8:30 —9:50	劲松 马璇	“非方言族”对本地方言使用和发展的影响
	李佳	方言进入基础教育之利弊分析
	许小颖 叶卫平 何怡 赵欣如 柯李瑞	嘎裂声的语音制约和社会制约
	张瀛月	滕州方言中 pf 类声母的语音变异研究
9:50 —10:20		茶歇
10:20 —12:00	刘宏宇 李雅	语言市场视野下的察布查尔县锡伯族双语现象
	尹小荣	双语教育模式与语言保持——以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语为例
	戴红亮	2011 年台湾语言文字热点及特点分析
	张丽红	迁移理论关照下的安徽中原官话与英语语音习得
	陈立平 李建 王旭	方言的声望——以常州话为例

9月23上午

时间：8:30—12:00

组别：B5

地点：图书馆三楼

主持人：张燕、姚春林

主题：民族语		
时间	作者	题目
8:30 —9:50	张黎 杜氏秋姮 高一瑄	中越边境贸易市场语言使用情况摘要
	额哈斯图雅	蒙汉双语牌匾语言的社会语言学分析——内蒙古地区牌匾语言为例
	红莲	蒙古语科尔沁方言的形成演变与人口迁移流动
	张燕	汉藏语系语言的时空模式和概念结构
9:50 —10:20		茶歇
10:20 —12:00	范丽君	杂居区人数占弱势的群体语言使用情况及成因探析
	夏迪娅·伊布拉音	维吾尔族汉语习得语法偏误分析研究综述
	姚春林	藏汉双语社区藏语文使用及态度研究
	潘海英	非洲诸国语言的本土化与全球化
	刘晓波	母语文化在外语学习中的作用

9月23上午

时间：8:30—12:00

组别：B6

地点：图书馆三楼

主持人：田剪秋、赵芃

主题：话语分析2		
时间	作者	题目
8:30 —9:50	吴东英 林敏奋	香港报刊广告文本变迁的再考察
	谷小娟	企业身份的全球本土化
	吴鹏	Trade Dispute as Discursive Manipulation
	田剪秋	心理治疗与咨询语篇研究：回顾与展望
9:50 —10:20		茶歇
10:20 —12:00	田贵森	“不礼貌言语”的社会语用功能分析
	王荔	大学生网络论坛“理工男”身份的话语构建
	赵芃	价格垄断话语的互语性分析
	张冬冰	A Case Study on the Closed-Class Patterns of Mongolian-Chinese Bilingual Discourse--Means of Identity Maintenance
	田海龙	关于批评话语分析的社会语言学学科属性的思考

摘要目录

边永卫	1
蔡丽青	1
曹德和	2
陈菲	4
陈立平 李建	4
陈立平	4
陈立平 李建 王旭	5
陈双双	6
陈星	7
崔艳英	7
戴红亮	8
代秀兰	8
丁素萍	9
董洁	10
额哈斯图雅	10
范丽君	11
冯捷蕴 张楠	12
冯学锋	12
付义荣	12
高丽群 刘彬	13
高陆洋	14
高一虹 林梦茜	15
高一虹、颜静兰、陈建平、刘毅等	15
古力加娜提·艾乃吐拉	16
谷小娟	17
郭骏	17
郭龙生	18
郭松	18
和媛媛	19

红莲	19
胡安琪	19
胡逸君	20
黄文林	21
黄英姗 陈春华	21
劲松 马璇	22
康晓娟	22
李昊平	23
李佳	23
李嘉郁	24
李伟	24
李咸菊	25
李晓娜	25
李艳红	26
刘楚群	26
刘宏刚	27
刘宏宇 李雅	27
刘晓波 战菊	27
刘毅 邓婷婷	28
毛力群	29
牟岩 王南冰	29
聂骅	30
潘海英 李菲	31
潘红彦	32
史咫阳	32
苏金智	33
孙雁雁	33
田贵森	34
田海龙	34
田剪秋 高一虹	35
田莉	36
佟秋妹	37
汪磊	37

王春辉	38
王丹	39
王家民	39
王荔 黄佩	39
王梅 夏慧言 傅钊	40
王培光	40
王珊珊 卢志鸿	41
王世凯	42
王卫兵	42
王玲	43
王英杰	43
吴东英、林敏奋	44
吴鹏 Huang Cheng-cheng	44
武小军 王庆	45
夏迪娅·伊布拉音	46
夏历	46
肖琳	47
谢俊英	47
许宏晨	47
许小颖 叶卫平 何怡 赵欣如 柯李瑞	48
杨荣华	48
姚春林	49
叶竹筠	49
易明华	50
尹小荣	50
张冬冰	51
张军	51
张蕾	52
张黎 杜氏秋姐 高一瑄	52
张丽红	53
张梅	53
张平	54
张天怡	55

张燕	55
张洋	56
张瀛月	56
赵冬梅	57
赵芃	58
赵燕	58
赵一农	59
赵玉超 陈建平	59
郑宝珊	60
郑海翠	61
郑梦娟 白杨	61
钟小佩	61
周洪波	62
祝晓宏	62

论文摘要

大学高年级阶段英语学习动机的发展 ——涉外文科院校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跟踪研究

边永卫

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

本研究结合量的和质的研究方法，在对一所涉外文科院校 2005 级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基础阶段跟踪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对他们在高年级阶段的英语学习动机类型、动机强度进行考察。结果显示，高年级大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与低年级阶段保持了总体上的连续性，如内在兴趣动机持续上升，且在质的材料中得到支持；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如质的材料分析中出现的考试动机，可以看作成绩动机在高年级阶段的表现形式。

教育培训/咨询机构命名用字情况调查

蔡丽青

广州大学

本文所涉及到的教育培训/咨询机构主要是指非学历类型的，其中包括儿童早期教育、中小学课外辅导、外语等级考试、出国留学、公务员及司法考试考前辅导以及电脑、会计、美容美发、汽车修理等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

通过网络随机抽查的语料进行数据统计，教育培训/咨询机构命名的用字情况，第一方面体现在高频语素或词语的使用上。该类机构机构一方面要与传统的中外教育思想相契合，另一方面又要适应市场的诉求，因此，在字号的选择上，往往带有鲜明的传统与时代特色。如“智”、“博”、“思”、“东方”、“世纪”、“精英”、“时代”等。

在高频语素或词语的统计过程中，我们还发现，在某个地区注册的教育/培训机构的命名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以北京、上海和广州三个一线城市为例，如有些北京地区的教育培训/咨询机构命名会带有“未名”、“京师”、“京城”、“清大”、“北大”等词语，上海则主要体现在“复”和“旦”两个语素上，广州则体现在“珠江”、“粤”等语素上。但相对于北京来讲，上海和广州的教育培训/咨询机构在用字的地域特色这一方面则显得没那么明显或多佯化。以其他国家或地区命名的机构则有“樱花”、“江户”、“索邦”、“迪士尼”、“山姆大叔”、“莱茵”等。富有地域特色的命名，可以让消费者从权威的角度去接受该机构，这是一种隐性的认知效果，从而使该命名更具说服力。

同时，该类机构命名的还带有明显的行业色彩。如早教机构中“婴”、“幼”、“宝贝”等是高频语素或词语；公务员培训机构的“政”、“途”、“阳光”等政治色彩或政治愿望相匹配的语速与词语；街舞等舞蹈培训教室通常会以全英文单词或中英语码混用等形式命名，这与街舞这种舞蹈形式的学习对象相关，因此我们可以从年龄的角度对这种命名现象进行解析。

在传统思想与经济效应的推动下，教育培训/咨询机构的命名不仅具备区别性作用，而且随着传播媒介的改变，特别是网络的快速发展，催生了许多新生的事物，促使新的语言诉

求点出现，教育培训/咨询机构的新诉求点主要表现在命名要素及其表现形式中，这体现了命名与当代社会需求的紧密联系。

言语社区与言语共同体

——试论 **Gemeinschaft** 在我国社会语言学中的两种翻译

曹德和

安徽大学文学院

德文单词 **Gemeinschaft** 所表达的学术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均有深刻论析；进一步追溯则会发现，在黑格尔晚年（1822-831）演讲合辑《历史哲学》中，可以找到对于前述概念的全面阐述。不过将它在社会学领域发扬光大，并使之成为人文社会学科的关键词，则主要归功德国社会学学会首任主席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 1855-1936)。1887年，滕尼斯的成名作《*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Grundbegriffe der reinen Soziologie*》出版，从此德语单词 **Gemeinschaft** 所表达的学术概念，一跃成为社会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学科的基础性概念。

1940年，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罗密斯 (Charles. P. Loomis) 将滕尼斯的以上著作由德文译为英文，因为无法为 **Gemeinschaft** 找到满意的译词，只好该著标题翻译为《*Fundamental concepts of sociology (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原著中的两个德文单词 **Gemeinschaft** 和 **Gesellschaft**，直接照搬，不加翻译——就像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两个法文单词 **langue** 和 **parole**，因在某些西文中找不到贴切译词，有的译者采取照搬原词的处理办法。直到1957年，罗密斯重版译著时，才决定借鉴罗伯特·E·帕克(Robert Ezra Park, 1864-1944)此前的做法，以 **Community** 和 **Society** 对译 **Gemeinschaft** 和 **Gesellschaft**。也正是从那时起，德文单词 **Gemeinschaft** 所表达的学术概念，才通过罗密斯的译著并借助英文更为巨大的影响力得以广泛传布。

滕尼斯前述著作后被译为中文。其中的 **Gesellschaft** 通常被译为“社会”，**Gemeinschaft** 如何翻译呢？在1992年商务印书馆推出的中文译本里，著名德文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林荣远先生将其翻译为“共同体”；而近年来有些学者则倾向采用“社区”译名。如2007年出版的《全球化进程中的上海与东京》（上海三联出版社，孙逊、杨剑龙主编），该书以节译形式对滕尼斯前述著作加以介绍，译者对 **Gemeinschaft** 便是采取“社区”译法。随着社会语言学的兴起，**Gemeinschaft** 表达的学术概念越来越多地在语言学著作中出现。我国语言学家论及 **Gemeinschaft**，起初大多以“共同体”为译名——根据期刊网调查，1962年至1979年发表的语言学论文，都是翻译为“共同体”，祝畹瑾先生当时推出的《社会语言学译文集》等，也是如此处理；而同一时期使用“社区”译名的语言学论文则基本没有。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以“社区”对译 **Gemeinschaft** 的语言学论文逐渐多起来，并呈明显上升趋势。

寻根究底，这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国外社会学对于 **Gemeinschaft** 的研究相继经历了三个阶段，即：（1）重视人际关系的“组织论阶段”（1887-1917）；（2）重视地缘作用的“区域论阶段”（1917-1975）；（3）重视多种因素合力的“综合论阶段”（1975年迄今）。二是社会语言学在其起步阶段，主要关注社会方言研究，而随着理论和方法的日趋成熟，有不少学者开始尝试将社会语言学研究范式引入地域方言的考察，具体地说，近年人们开始以社会语言学的眼光，透视地方文化和历史区划等社会因素对于地域方言尤其是都市方言的影响。三是改革开放后，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的新形势，防止社会服务缺位，促进社会稳定和谐，我国政府将加强社区建设作为重要国策，从而大大增加了“社区”一词的知名度。正是在以上三方面原因的作用下，我国学界对于 **Gemeinschaft**

译名选择出现不同以往的变化。

以上是从外因角度寻求解释，仅仅这样做显然不够，“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真正有力的解释应当建立在内因考察的基础上。

德文单词 *Gemeinschaft* 转为中文时存在多种译法，且译名选择缺乏稳定性，甚至出现朝三暮四的情况，从内因角度看其实不难理解。

在《*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一书中，滕尼斯明确告诉我们，*Gemeinschaft* 指向的不是某个实体而是某个类聚，用今天的话说它指向的是一个原型范畴(prototype category)。原型范畴中聚集着彼此之间具有相似关系的诸多成员。滕尼斯主要考察了这样三种成员：一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亲属 *Gemeinschaft*”，二是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邻里 *Gemeinschaft*”，三是建立在共同信仰或兴趣基础上的“精神 *Gemeinschaft*”。因为这三种 *Gemeinschaft* 都具有以下特征，即：a. 行为规范的一致性，b. 彼此互动的频繁性，c. 相互认同的自觉性，以及因为得益于前述特征，使的 *Gemeinschaft* 成为关系紧密的共同体而非像 *Gesellschaft* 那样的松散组织，所以有不少学者选择“共同体”对译 *Gemeinschaft*。而也正是因为作为 *Gemeinschaft* 典型成员的“邻里 *Gemeinschaft*”离不开地理区域且孕生于特定地理区域，所以又有不少学者认为，将“社区”作为 *Gemeinschaft* 的译词乃是不错的选择。最初作出这样选择的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对此他毕生引以为豪。

对于以“社区”翻译 *Gemeinschaft* 有不少学者提出批评，理由是滕尼斯看重的是“共同”性而非“地域”性，这样翻译违背作者初衷；再就是认为“社区”一词无法涵括“精神 *Gemeinschaft*”，因为这类 *Gemeinschaft* 的形成不受地域制约。

以上批评不无道理但未必适当。众所周知，“词素”和“语素”是我国语言研究中经常使用术语，它们都是通过翻译英文单词 *morpheme* 而形成，正像俗语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这两个译法都存在一定缺陷，但又各有各的长处。比如说在考察汉语最小音义结合体存在形式的场合，这时自然是选择“语素”译法较为适当；而在进行汉英构词方式比较的场合，这时无疑是选择“词素”译法更为顺理成章。与此相类，“共同体”和“社区”这两种译法也是缺点与优点同在。这里只说优点。比如说在专门考察网络语言使用群体的场合，这时选择“网民共同体”的说法无疑胜于采用“网民社区”的提法；而在以社会语言学方法研究某个地域方言使用群体的场合，这时选择“××社区”的表述无疑要比采用“××共同体”的说法强。语言翻译需处理好“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关系。过分拘泥前者等于彻底否定翻译的创造性和服务性；过分强调后者，则使翻译失去客观性和可信性。

综上所述，我们以为对于德文单词 *Gemeinschaft* 的中文翻译无需追求一律定于一尊。同时我们以为，在同时存在多种译词（除了“共同体”“社区”以外，还存在“社群”“社团”的译法）足够使用的情况下不妨因需制宜，而不必胶柱鼓瑟地去创造“虚拟社区”之类似乎多余的说法。最后我们想要提醒的是，随着社会步入网络时代，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早已不复存在，从而 *Gemeinschaft* 与地域的依存关系日益疏离，正是在此背景下，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早在多年前就已提醒人们注意当今 *Gemeinschaft* 的“脱域”（*Disembedding*）现象。概言之，在有关 *Gemeinschaft* 的研究中，既不宜无视地域作用，亦不必将其视为充要条件，否则只会遮蔽自己的视线，束缚自己的手脚。

国外语言教育政策对我国语言教育的启示

陈菲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随着全球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语言在各领域的广泛使用越来越显著，语言的全球化和多元化对社会的各个层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高效、合理使用语言的重要价值。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际上，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往空前频繁，经济竞争日趋激烈，在国内，经济活动异常活跃，告诉经济增长持续保持，这些都对国民语言水平和相关企业的多语交际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的语言教育到底呈现出怎样的状况呢？本文着重以我国外语教育为切入点结合欧盟以及美国的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发展，阐释我国语言教育的现状及发展，以及欧盟及美国的语言教育政策对我国语言教育产生的思考。

Spanglish 现象本质透视

陈立平 李建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西裔群体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并且在过去 10 年其增长速度居美国各种族群体之首，社会各界对其关注也与日俱增。以往国内关于美国族裔语言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对黑人英语变体的研究，而对现今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群体——西裔社团的语言现状的研究很少涉及。西裔群体的主要语言是英语、西班牙语和两者的混合体 Spanglish，笔者认为作为混合体的 Spanglish 极富学术研究价值。在西语社区里，除使用享有较高社会声望的英语及其母语西班牙语之外，两语言接触形成的 Spanglish 作为一种语言混合体也常出现在西裔社区的街头巷尾。本文先概述学术界关于 Spanglish 的争议，随后通过考察其产生背景和使用现状，分析了 Spanglish 的本质。笔者认为 Spanglish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 Spanglish 带有大量英语成份的西语，属于西语的一种方言变体；广义的 Spanglish 是语码转换过程中产出的异于英语和西语的新语言形式，并有潜力发展为一种新语言。

从双言到双语

——常州市民城市化进程中的语码选择

陈立平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有许多社团同时存在两种语言或语言的两种变体，各用于不同的功能，这种现象叫作“双言”或“双言现象”（diglossia）。通常情况下，有一种语言或语体比较标准，被称为“高语体”（High variety，简称 H 体或 H），用于政府、新闻媒介、教育、宗教等活动，而另一种

则为无声望的语言或语体，被称为“低语体”(Low variety，简称L体或L)，用于家庭成员或朋友之间的交谈。当一个人掌握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或语言变体，并能交替使用这些语言或变体时，他被称为双语人；当双语人不遵守语言的功能分配，在同一种语域中使用两种语言或语体时，便发生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

通过对376名常州市民在16种不同语域的语码选择和语码转换情况调查，我们发现常州话和普通话的相互关系处在广义的双言向双语(码)过渡的范围内。首先，常州话和普通话具有双言的特点，比如普通话用于学校教育、新闻媒体报道、国营服务行业等正式领域或非私人领域，而常州话一般用于家庭域和朋友域等非正式场合以及以本地人为主的工作场所，两者基本属于互补分布；普通话属于有声望的高语体，而常州话属于粗俗的低语体；普通话有大量的书面文学作品，受到所有常州人社团的珍视，而常州话几乎不存在书面文学；常州话通过自然习得母语的方式获得，而普通话通过学校教育或特别教育才能学会，等等。其次，随着国家普通话推广力度的加大、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流动的增加以及社会网络的进一步开放，常州人，尤其是从学校回到家里的青少年学生，正在逐渐打乱普通话和常州话的功能分配模式，将在学校或部分工作场所等使用的高语体普通话渗漏到家庭域和朋友域等低语体领域，造成混合语码的产生。另外，工作场所本来是低语体常州话的领域，但现在在非强制性使用普通话的工作场所，由于外来人口的增加而造成频繁的语码混用和语码转换。

我们认为，当越来越多的常州人接受普通话教育，当普通话不再是少数受过教育的人的专利，当普通话和常州话出现功能融合，当我们难以预测某些说话个体在具体的交际场景会使用什么语码的时候，实际上双言现象正在消失，我们所面临将是“后双言制”(徐大明, 2004)或个体的双语(码)现象了(Fishman, 1967)。本研究揭示了一个潜在的问题：当人们在语言规划中把注意力集中在普通话的推广时，往往忽略了弱势语言和方言的保护和维护。曹志耘(2010)提出建设方言生态博物馆的设想，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定能对我国的语言保存和保护做出历史性的贡献。

方言的声望--以常州话为例

陈立平 李建 王旭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在我国，普通话是受过教育的人使用的语言，掌握普通话给语言使用者在升学、就业、工作等方面会带来优势，所以普通话在我国具有明显的“显性声望”。与“显性声望”相对应的是语言的“隐形声望”，所谓“隐形威望”，即由于语言使用者自觉地或不公开地表露出偏爱使用非标准的言语形式，以显示与集体的一致关系，从而使非标准言语形式具有的一种不公开表露的威望。

本文用配对伪装测试的方法，以101名常州市高三学生为研究对象，来研究普通话和常州话在常州市民心目中的声望。本论文的问卷调查从相貌、能力、人格和魅力四大项中的19个小项将普通话和常州话变语人的得分进行比较。实验结果显示，普通话和常州话变语人在相貌特征和魅力特征方面无显著差异，但是在能力特征和人格特征方面，常州话变语人的得分高于普通话变语人的得分，且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意义。在19个小类中，“身体胖”、“年纪小”、“诚实”、“可爱”、“有幽默感”和“很风趣”这六个小类方面普通话变语人的得分高于常州话变语人，在“个子高”、“漂亮”、“聪明”、“有进取心”、“有自信心”、“有领导

才能”、“有勇气”、“可靠”、“谨慎”、“和善”、“有个性”、“社交能力强”、“待人热情”这11个小类中，常州话变语人的得分高出普通话变语人，并且在“有领导能力”、“有勇气”、“谨慎”、“和善”和“社交能力强”这五个小分类上，其差异达到显著性水平。

该研究说明，虽然普通话是国家推广的、受过教育的人使用的语言，具有明显的显性声望，但是由于长期形成的习惯、地域情感以及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等因素，常州话在常州人的潜意识中还是具有显著的隐性声望。

小议淘宝体中“亲”字的泛化与影响

陈双双

吉林大学文学院

语言与社会文化一直处于相互影响的状态，语言的变化发展不完全是孤立和自发的，而是受到了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而语言反过来又对社会文化的变迁产生反作用。随着当今时代信息网络的迅速发展，网络语言层出不穷，产生了大量网络新词，这些新词不仅成为上网一族的常用语言，也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口语中，淘宝体中“亲”的广泛使用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个例。淘宝体是说话的一种方式，最初见于淘宝网卖家对商品的描述。淘宝体后因其亲切、可爱的方式逐渐在网上走红，2011年7月南京理工大学向录取学生发送“淘宝体”录取短信。2011年8月1日上午，一则关于外交部微博“淘宝体”招人的消息在网上流传。“淘宝体”从网络走向百姓生活，再迈向我们平常看起来端庄严肃的政府单位，说明网络语言正日益影响我们的社会语言。

因此，本文将以淘宝体中的“亲”字为例，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探索淘宝体中“亲”字背后的语言学现象，研究这种新语言现象产生的原因、过程与影响，从而进一步讨论网络渗透对语言创新的影响。本文将首先通过对照“亲”在现代汉语中的常规用法来说明在新的语言环境中，“亲”所增加的新的语法功能和词汇意义，并从信息传递模式的角度探讨其产生的原因，与语义广义文章化、称谓泛化、社会语用功能密不可分；其产生的过程，流传之广则不仅与信息发达有关，更涉及到语言的经济原则等因素；其广泛流行则说明了人们对某些网络语言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也折射出在这个信息时代，我们的语言将不可避免地收到网络语言的影响，而我们该如何面对这种影响，把握好网络语言这把双刃剑，这也将成为本文探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将浅层次地探讨一下在当今这个信息社会，语言创新与网络渗透之间的关系。

A Diachronic Study on Chinese-English Code Switching in Chinese Newspapers Advertising

陈星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Newspaper advertisements are known to all as a device for marketing. The advertising discourses reflect the latest trends of languages as well as the society. Therefore, the phenomenon of Chinese-English code switching is also commonly seen in newspaper advertising nowadays. Previous overseas studies deal with the code switching advertisements in non-Anglophone advertising. Studies in China deal with introducing overseas research findings, exploring models and empirical studies. However, little has been devoted to diachronic study of code switching in newspaper advertising in mainland China. This study on code switching of advertisements in Chinese newspapers is based on a collection of 1090 advertisements printed on *Beijing Evening News* with a time span of 30 years. The Markedness Model proposed by Myers-Scotton serves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is study. Through the study, the researcher has found: (1) there are more unmarked code switching than the marked code switching, which is in accord with the study on the lexical categories of code switching; (2) It indicates that the advertisers are not confident about the readers' bilingual language abilities, for few of them choose marked choices that demand a better linguistic competence; (3) Marked code switching has special functions such as indicating emotions and having aesthetic effects, which is important for advertising. From the study one knows that marked code switching does not overflow into the newspaper advertising as the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increases, for its number decreases after a peak, reflecting advertisers' rationality in applying marked code switching in China. The statistic also shows that marked choices of codes are usually applied in the advertisements for those products in the growth stage. The growth stage is one of the four stages of one product in a product life cycle. (The other three are market introduction stage, maturity stage and decline stage.) This phenomenon and the result of the study reflect China's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30 years.

语码转换与社会身份建构研究

崔艳英

太原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语码作为一个较中性的概念，主要指一种语言或者语言变体。语码转换则指在交际过程中，人们根据交际情景的需要在各种不同语言变体之间选择和转换。语言的功能之一就是建立人际关系并建构个体的社会身份。作为身份建构的主要媒介，语言在身份研究中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语码是不同社会身份的主要标识手段，也即身份是在语码选择的过程中得以动态建构的。本文主要关注语码转换的社会意义层面，分析人们在语码选择过程中如何实现交际者社会身份的构建；如何能动地协商和维持交际双方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在多语环境中，

人们如何通过语码选择来确立自己的不同社会身份。影视作品很多都是以多语环境为呈现背景,其人物身份塑造也是借助于语码得以实现的。本文主要拟以多部影视作品中出现的语码选择为语料,分析剧中人物是如何通过语码选择来实现社会身份的动态建构。

2011年台湾语言文字热点及特点分析

戴红亮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2011年台湾语文热点比较集中,“中华文化基本教材草案”“台语文风波”“设立台湾书院”“台湾选举与语言认同”贯穿全年,简繁问题也在台湾引起较大争论。今年热点问题的基本特点是:热点问题比较集中,持续时间长;热点问题冲突性强;热点问题与台湾政治和两岸交流密切相关;国语和乡土语言在选举年对立严重;相关政策和措施体现妥协性。

文化软实力提升需求下的英语旅游宣传语言规划研究

代秀兰

廊坊师范学院

宏观的,全局的语言规划研究已趋于成熟,着眼于一个地区或某一行业领域的语言规划正在兴起。国外的语言规划发展较早。美国公布的“国家安全语言计划”不仅是外语教育计划,而是具有明确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的语言战略计划(王建勤,2010)。我国的汉语语言规划和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外国语言规划长期被忽视,仅有的研究限于外语教育政策方面(张绪忠,王晓辉,2011)。特定领域的语言规划研究极少。目前国内英语旅游宣传资料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发现及探讨宣传资料中的错误及相应的解决办法。然而,避免语言错误离不开整体规划,语言规划研究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本文拟在调查河北省英语旅游宣传语言使用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有效利用英语旅游宣传资料传播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全局规划、科学管理的具体实施策略。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语言政策提供参考。

信息传播途径的多元化将为调查带来一定的难度。在全面调查基础上进行的语言规划将更具可行性及实用性。本文将尽力覆盖各传播途径中的语言使用情况,尤其是近年来信息传播覆盖率越来越高的网络宣传并提出其语言使用规划措施。论文内容包括英语旅游宣传语言的使用情况,包括网站介绍,旅游景点公示介绍等各途径中的语言使用。英语旅游宣传语言使用规划与文化实力提升间的辩证关系。统筹规划、管理英语旅游宣传语言使用的具体实施策略。

对英语旅游宣传这一特定领域语言使用规划的研究将扩展语言规划研究的范围。语言规划将为旅游资料宣传研究提供新视角。语言是文化传播的基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大小的重要指标。旅游宣传中使用的语言关系着文化传播的效果。对旅游宣传中的语言使用进行规划,对提高地区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价值。

在有声与无声的投射中识解作者身份

——对《爱丽丝奇景漫游记》的爱丽丝话语与思想的投射解读

丁素萍

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语言证言人的社会身份。从语言识解的层面看,社会语言学主要从语音、词汇、语法、语用四个方面进行探索,证实语言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角度将使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识解人在语言中的言语活动、言语角色和身份。本研究将以系统功能语法为基础,引入投射理论,在小句复合体层面上对语言的概念功能(主要是逻辑语义功能)和人际纯理功能进行分析。语言作为资源用以建构人类内外经验现实的功能被称之为概念功能。概念功能又分为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前者以小句为单位来实现,后者以小句复合体为单位实现。而涉及到对话当中发话者和受话者之间的交际、确定总体社会角色的语法资源被称之为人际纯理功能(Mathiessen & Halliday, 2009:119)。语言的人际功能是讲话者作为干预者的“意义潜势”,是语言的参与功能。通过这一功能,讲话者使自己参与到某一情景中,来表达他的态度和推断,并试图影响别人的态度和行为(胡壮麟等, 2005:115)。小句层面上的逻辑功能主要体现在小句复合体内部的两种逻辑语义关系上:扩展和投射。系统功能语言学概念意义上的投射指的是一个言辞和心理小句过程通过另一个小句来投射内容。投射的模式有引用和转述两种模式,说话人对两种模式的选择将反映其人生态度,反映他是否参与人物的话语或思想表述。小句层面上的另一个功能即人际功能,主要通过语气结构来体现。对不同的语气结构和相应的言语功能的选择,可以确定或反映不同的说话人与听话人的(社会)角色关系。以上两种功能结构都可以实现叙述者的介入与不介入,从而传递一种有声或无声的态度倾向。

本研究将以《爱丽丝奇景漫游记》为例,分析该文本主人公的话语和思想投射。首先,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为基础从功能语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层面建立相应的言语和思想投射层次系统。该网络系统将体现话语人利用语言资源在小句关系、言语角色、言语功能、引用原措辞或重述原语大意、介入与态度等项目上进行选择的思想。然后将根据三个层次对文本中的言语和思想投射进行特征描述、叙述者介入的相关因素分析以及叙述者的有声和无声的角色讨论。研究将采用特征描写、定性分析和定量统计相结合,对小说主人公爱丽丝的言语和思想投射小句进行分类和分布的分析。初步的研究发现,叙述者的身份与他是否介入或有声有关。而是否介入主要体现在叙述者选择表达小句逻辑语义功能的投射模式、以及人际功能的语气结构和言语功能有关。在投射主人公的话语和思想过程中,叙述者选择尽可能减少自己的“声音”:尽可能减少介入爱丽丝的话语和思想活动,而倾向于让儿童自己说话、自己思考,让读者直接感受儿童的话语和思想,因而建构了作者在小说中的特殊身份。

Mobility, voice, and symbolic restratification: An ethnography of 'elite migrants' in urban China

董洁

清华大学 Tilburg University, the Netherlands

In this paper I explore class (re)stratific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through the use of various semiotic resources by a group of 'elite migrants' who are highly mobile within the country as well as globally. I identify two sets of semiotic resources and argue that they are different forms of voice articulating the different angles and directions of class distinction. The first set of resources are external criteria of group membership, expressed by their control of languages – Putonghua and English – that are not tied to one place but offer the mobility that characterizes their social class. The second set of resources are internal criteria of membership ('mensao') connected to and predicated on knowledge of particular consumption commodities. The fieldwork data demonstrate a multidimensional complex of voice, internal as well as external and with several scales being oriented towards. Through these resources the elite migrants create an identifiable 'middle class' vo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蒙汉双语牌匾语言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内蒙古地区牌匾语言为例

额哈斯图雅

赤峰学院蒙古文史学院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

牌匾语言，顾名思义，就是牌匾为载体的语言现象。牌匾语言通常指国家和地区行政单位名、企业名、店名、路标等所使用的语言。牌匾语言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很早秦汉时期开始一直到如今，在漫长的岁月里牌匾语言一直成为人类社会语言活动的一个领域，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起着很重要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如今牌匾语言已关系到政治、经济、文化等人类社会活动的各领域，从不同角度研究它的成作品益增多，可见牌匾语言越来越被人们重视。

我国是多民族的大家庭。语言文字应用方面有着多样性。牌匾语言也不例外。各少数民族地区牌匾所除了通用的汉语言文字以外还并列使用者自己民族语言文字。内蒙古地区牌匾近年来经过加强管理和整顿、统一规划和进一步规范，现在已做到从基层到首府凡是内蒙古自治区行政管辖内地区都使用蒙汉双语牌匾，可见已形成有地方特色的牌匾文化。

本文基于内蒙古地区部分牌匾语言调查资料，对蒙汉双语牌匾语言进行社会语言学分析。其内容由四个部分组成：

第一，蒙汉双语牌匾语言的社会功能。此内容有以下几点：（一）、它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有关政策法规及其实际落实情况，同时也肯定了蒙古族语言文字使用权利的法律保护。（二）、正因为有了政策和法律的保护，蒙汉双语牌匾语言它本身包含了语言的多样性和平等性，它并列使用了国家通用汉语文字和蒙古族语言文字，双语之间便是相互补

充、相互辅助的和谐关系融入到人们社会语言活动当中，给蒙汉两个民族使用者共享语言权利和交际的畅通。（三）、了解蒙古族语言文字应用实态及对其研究、科学保护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提供直接的和具体的数据资料。

第二，蒙汉双语牌匾语言的文化内涵。语言及其文字是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早在2003年，为了开展草原文化研究、推动草原文化繁荣发展，扩大草原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内蒙古自治区启动了“草原文化研究工程”和“九个一批”文化工程，兴起了以草原文化为标志的民族文化大区建设。在其多途径之中，蒙汉双语牌匾语言折射出的内蒙古地区地方特色文化和蒙古族传统文化之功能是不能忽略的。（一）、它体现出地方特色文化。莜面和稍美是内蒙古西部地区的特色食品，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地区以这两个食品为主题的牌匾很多，比如，莜面大王、特色莜面馆、美味稍美、稍美王等。牛羊肉和奶制饮食品是内蒙古的特色畜产品，以此命名的牌匾也到处可见，使顾客先大饱眼福，后大饱口福。（二）、它承载着蒙古民族的历史足迹和传统文化。内蒙古地区牌匾上内蒙古这三个字是必然有的，这一个词意味深长，它蕴藏着蒙古族历史的变迁和文化的演变。其它牌匾如：敖特尔奶茶、苏力德服饰、戈壁奶茶、马拉勤饭店、敖包旅游区、八骏广场等名称都关系到蒙古族游牧文化所形成的风俗人情。（三）、它展现着内蒙古地区蒙汉两个民族语言文字完美结合、艺术审美和谐融入的文化氛围。牌匾的结构设计来看，双语文字以外还有民族特色的花纹图案和颜色装饰，使人们联想起民族团结、和平共处的人文景象。

第三，蒙汉双语牌匾语言的经济价值。牌匾语言属商业语言。每个牌匾语言都给人们提示着经营者商业理念和经济追求。并且在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起着桥梁的作用。从经营者的角度，蒙汉双语牌匾语言给两个民族的消费者提供语言够通，信息传递，从而使经营者通过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享受到经济效益。语言的经济价值还可以以它的实用性来体现。从消费者角度，在交际当中，蒙汉双语牌匾语言的应用，使两个民族的消费者避免了因语言不通而不能交往所遭受的利益损失，即给他们创造经济收益。

第四，蒙汉双语牌匾语言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建议。存在的问题：（一）有些牌匾无蒙文字、或者蒙文有错别字、乱译、错译、蒙汉文书写和挂放错位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样的问题不仅在普通店面牌匾上，机关单位的牌匾上也存在。（二）蒙文字写法不正确、不规范，字迹不清和蒙汉文字破损、脱落。（三）内容不健康，用词庸俗，不文明。（四）书写、刻字、制作所使用的蒙汉两种文字的字号不统一而大小不一致，比例失调（具体例子将附图片）。这些问题违反了有关使蒙汉双语言文字有关法律法规，伤害了民族感情，破坏了语言平等、民族平等的和谐关系。解决问题的建议：加大蒙汉双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宣传力度、加强语言文字的综合治理工作、提高法律监督和监管力度、提高商家、牌匾制作人员的素质，来对其进行必要的规范。提高蒙汉双语翻译工作者的专业素质，确保牌匾语言翻译的准确性、统一性和民族性，以此更进一步体现内蒙古蒙汉双民族语言和谐关系和团结氛围。

杂居区弱势群体的语言使用特征 ——以德宏芒市三台山乡和芒市城区为例

范丽君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其城镇和农村人数上占弱势的民族群体语言使用存在差异。本文对城镇和农村的这些群体的母语和兼用语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

在农村，母语使用具有很强的活力。越是弱势群体，语言兼用能力越强；在城镇，母语使用出现代际差异。普遍兼用汉语，但短期内兼用民族语现象还会存在。

中澳媒体话语的跨文化对比研究

——以力拓间谍案为例

冯捷蕴 张楠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英语学院商务英语系

关于力拓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和政治领域，至今鲜有研究从中国和澳大利亚媒体话语的视角研究该案件，并分析背后的跨文化成因。以“文化中心主义”为主要理论，对比研究中澳媒体关于力拓间谍案的媒体话语是一种全新视角。研究结果认为：以《悉尼先驱晨报》和《澳洲人报》为代表的澳方媒体使用了很多夸张的报道方式，如：扩大经济的负面影响、使用泛政治化的表述、强化文化的误读，并且较多地违背了“平衡性”报道的原则。研究还发现：西方学者所持的中国媒体只报道正面的观点是片面的。无论是中方官方媒体如《人民日报》还是非官方的媒体如《南方周末》都表现出自我反思，而且新媒体中呈现出多维视角的报道。同时，必须指出：中国媒体也存在议程设置缺乏主动权、回应能力不强的问题。本研究意在强调批判性地接受西方观点，同时倡导中国媒体应加强跨文化的传播，以增强媒体话语的信服力。

当代中国语言年俗论

冯学锋
武汉大学文学院

语言年俗，指用语言及其相关形式贺岁的习俗，它是社会语言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主要指 21 世纪以来在中国大陆逐渐兴起的以年终语言盘点为主要形式的语言贺岁活动。当代中国的语言年俗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产生影响，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意义和学术研究价值。

回顾与反思：关于农民工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付义荣
集美大学文学院

一、研究现状

中国社会语言学对农民工的调查与研究约始于 2006 年，按其研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六个类型：话语分析类、语言使用类、语言学习类、语言态度类、语言本体类和理论探讨类。

二、存在的问题

中国社会语言学关于农民工的研究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研究内容过于集中，甚至重复。当前关于农民工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过于集中于农民工的语言使用，很多内容大同小异，聊无新意。

第二，过于注重描写，忽略理论建设。

第三，存在明显的“重城市轻农村”倾向。调查地点绝大多数都是城市，研究的结论也基本是站在城市的立场。

第四，现有调查研究多是单打独斗，缺乏团队合作。

第五，调查方法单一，且缺乏规范。

三、几点建议

第一，注重各项研究之间的平衡与联系。

第二，注重理论的构建与创新。

第三，增强团队合作，扩大调查规模。

第四，密切关注农民工群体出现的新变化，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与研究。

“-ling类单词”中边音/l/兼做韵头与韵尾的发音方式的认知分析

高丽群¹ 刘彬²

1. 北京城市学院 2.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边音/l/作为辅音的特别之处在于其在单词中的角色非常灵活：既可出现在词首做韵头（清晰音/l/）又可出现在词尾做韵尾（模糊音/l/），同时还可以处于词中位置。清晰音与模糊音同属同一音位/l/，但其发音方式却不尽相同（Roach 2000）。林涛、王理嘉（2004）提出，作为辅音的边音/l/与元音有相似之处。其在语图上的表现与元音基本相同，只是垂直条形（vertical bar）的深度比元音浅些，其共振峰（formant）的强度比元音弱。Ladefoged (2001: 230) 也指出，“有时很难区分一个辅音是充当一个音节的韵尾还是另一个音节的韵头。”

鉴于以上所述特征，处于单词中央的边音/l/既可以作其前一音节的韵尾，又可以作其后一音节的韵头，亦或两角色兼任，其兼做韵头和韵尾时发音的模糊性在 *feeling, telling, pulling, smiling, rustling, tickling* 等这类以边音/l/结尾并带有曲折变化 -ing 的单词中的表现尤为明显。本研究将这类词统称为“-ling类单词”。许多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对于此类单词中的边音/l/的发音方式多有不同。比较明显的有两种方式：其一是将/l/作为前一音节的韵尾（coda）同时作后一音节的韵头(onset)，即清晰音/l/（clear /l/）和模糊音/l/（dark /l/）并存；另一种方式是将/l/作为后一音节的韵头而在其前面的音节中不充当任何角色，即仅仅将/l/发成清晰音。

针对边音/l/在音节中扮演的两种角色：韵头(onset)和韵尾（coda）这一现象，本研究以某研究生院非英语专业硕士生及英语外教为受试对象，使用录音软件 Cool Edit 对受试对象的“ling类单词”进行了录音，之后使用语图软件 Praat 获取各单词录音的语图，在语图上截取每位受试者发/l/音的音段，然后记下该段的时间长度。通过对比该长度，对英语学习者对于边音/l/在“-ling类单词”中的发音时长特点进行了描述，讨论了边音/l/在“-ling类单词”中的音节归属问题；同时试图尝试解释导致边音/l/在“-ling类单词”中具有不同时长的现象，探究英语学习者对边音/l/的发音时长和听觉效果的差异，并力图寻找导致这种差异的认知因素，从而提出较接近英语本族语者的/l/的发音方式。

关注涉外婚姻家庭儿童语言问题，强化学术研究与政府举措

高陆洋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东方语学院 朝鲜语系

根据 2011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居住在我国境内并接受普查登记的外籍人员为 593,832 人。与此同时，我国的涉外婚姻数量也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1996 年至 2002 年的 7 年间，在上海登记的涉外婚姻超过 2.1 万对，平均每年 3000 对。

尽管涉外婚姻家庭作为一个日益发展的社会现象，正在得到政府和学界的重视，但对涉外婚姻家庭儿童语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还有待提高和深入。儿童的语言选择和语言发展，不仅关乎儿童自身的智力和其他能力发展，而且与语言使用者自身身份构建有着重要的关联性。在多元族裔语境下的身份构建主要涉及的就是语言使用者的民族认同问题。民族认同不仅指对本民族语言文化的信念和态度，而且包括对他民族语言、文化及人群的适应问题。因此，不管是把涉外婚姻家庭子女看作“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其汉语能力的高低，对其民族认同、文化认同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大多数涉外婚姻家庭所处的“双语”甚至“多语”环境中，哪些因素、如何影响儿童的对汉语作为母语或第二语言的选择和习得？在这样的家庭中，汉语的地位是怎样的，汉语的习得状况是怎样的，哪些因素影响汉语作为母语的选择和习得，而语言能力发展上的差异会引发怎样的儿童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这些都是政府和学界应当关心的问题。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相关领域的研究和举措还有待得到进一步的重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韩国近年来也面临着涉外婚姻家庭急剧增长的新局面。作为一个较典型的单一民族、单一语言国家，这种由单一文化社会向多元文化社会转变的社会发展趋势引起了韩国各界的高度重视，其中涉外婚姻家庭子女的母语—韩语语言能力问题是焦点之一。韩国关于涉外婚姻家庭儿童语言能力发展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保护“韩国语”作为母语地位的不动摇，在此基础上，发挥多语言环境优势，促进双语能力的发展。对此，韩国政府和学界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其具体举措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具体内容省略）。

同时，我国的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有别于韩国，涉外婚姻家庭在我国家庭总数中所占比重、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还没有象韩国那样明显，而且我国涉外婚姻家庭在中外组成人员的性别比例、家庭整体教育水平和经济水平、结婚目的、取得国籍的趋向等方面都与韩国有着较明显的区别，存在的问题自然不尽相同。因此，我们不能照搬韩国的政策，而须根据自身国情和实际情况，通过全面细致的调查和研究，探索相应的措施。建议在政府主导的体制下，强化对涉外婚姻家庭子女语言发展问题的关注，投入人力物力对代表性城市的相关情况进行精确掌握，在此基础上，政府与学界共同努力，对相关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性探索，总结经验教训，出台行之有效的对策，以有效地应对涉外婚姻给我国语言事业带来的影响。

“小心地听”与“大声地说”

--奥运志愿者语言态度与文化认同面面观

高一虹¹ 林梦茜²

1. 北京大学 2. 美国普渡大学

本研究考察了大学生志愿者在北京奥运会之前、奥运期间和奥运之后对世界英语的态度，以及民族与国际身份认同。研究对象为 200 名北京奥运会大学生志愿者，研究方法包括世界英语变体的主观投射测试、个别和集体访谈、参与观察。主观投射测试对象奥运前 200 人，奥运后 97 人（其中 69 人参加了奥运前测试）。测试涉及的语言变体包括美国英语、美国黑人英语、英国英语、印度英语、中国英语。参与了奥运前、中、后的访谈对象 22 余人。奥运前后的数据特别是主观投射测试结果比较显示，志愿者对于世界英语各变体的态度总体上没有发生明显改变，对于英语内圈变体（英、美英语）的评价远远高于外圈（印度英语）和扩展圈变体（中国英语）。这揭示了志愿者保守的语言态度，以及忠实追随本族英语变体的“听者”身份认同。

与此同时，访谈材料显示，在抽象的理性层面，志愿者对“中国英语”以及其他外圈、扩展圈世界英语变体的认同程度较高。在某运动场馆对志愿者奥运口号变化的参与观察发现，志愿者充满激情地提出“We speak and the world will listen”（我们说，世界将聆听）的口号，彰显鲜明的“说者”民族身份认同。另一方面，他们在奥运服务过程中也呈现出“对话性交流者”姿态，其中蕴涵着民族与国际身份认同的互动。

研究揭示，大学生志愿者对世界英语的态度在理性表达与情感投射、抽象观念与具体变体层面之间存在区别--在理性的、抽象的层面开放，在情感的、具体的层面保守。大学生志愿者显现了矛盾、复杂的身份认同--他们一方面是英美英语标准的忠实模仿者和膜拜者，“小心地听”；另一方面也理性地肯定本土英语变体，用民族的声音“大声地说”。而“对话性交流者”的出现，显现了语言和文化认同整合的未来方向。

跨文化志愿者的语言态度、民族与国际身份认同

--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深圳大运会考察

高一虹、颜静兰、陈建平、刘毅等

本研究以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深圳大运会志愿者为样本，考察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志愿者对“世界英语”(Kachru, 1992)的态度，以及英语使用中的民族与国际身份认同。我们采用量与质相结合的方法，在 2007 年 10 月至 2011 年 10 月期间，对上述四会的约 1200 名志愿者进行了调查。研究方法包括：1) 采用以多种英语变体录音为刺激材料的“主观反应测试”考察语言态度；在有条件的地方，在活动前、后对同一批受试分别测试，比较其结果。2) 对志愿者进行个别或集体访谈，了解其语言态度、在跨文化交流活动中的经历和身份认同、其变化及其过程和原因。四地在保持主要研究问题、“主观反应测试”及其定量分析方法一致的前提下，还根据当地具体情况，选择了各有特色的具体研究问题和材料采集分析方式。

整体研究结果发现，志愿者对于世界英语的态度趋于保守，对于英语内圈变体（如英、美英语）的评价远远高于外圈（如印度英语）和扩展圈变体（如中国、日本英语），这一态度在跨文化活动前后没有在量的层面发生显著改变，但质的材料呈现了较为细微复杂和多元

的态度变化。语言态度在理性表达与情感投射、抽象观念与具体变体层面之间存在区别。志愿者具有明确而坚实的中国民族认同，在跨文化活动中这一民族认同是其主导认同，并得到激发和强化；国际身份认同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民族与国际身份认同有一定“生产性”（高一虹，2001）的相互深化。与此同时，文化刻板印象普遍存在，在活动过程中有些弱化，有些同前，有些甚至被强化。

研究显示，在全球化和中国和平崛起的背景下，我国跨文化志愿者对世界英语的态度显示出与其多元化语境不匹配的保守性，仍以英美本族语变体“忠实模仿者”为主导模式。与本族语变体具有同等权利的英语“合法言说者”也在发出声音，特别是在抽象的理性层面。与此同时，在部分志愿者身上还萌发出立足于本土面向世界的“对话性交流者”身份认同。研究呼吁对于“世界英语”变体更加宽容的态度，将其接受性技能纳入跨文化志愿者的培训和英语教学，并加强多元文化意识的培养，促进民族和国际认同的相得益彰的增强。

论城市化对民族地区生活语言的影响

——以新疆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的语言使用情况为例

古力加娜提·艾乃吐拉
新疆师范大学语言学院

近 10 年间我国城市化以约 10% 的年平均速度在不断地发展，不管从其规模，还是其发展速度，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发展过程。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引起了各种变化。本文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探讨城市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生活语言的影响。

建国时期，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低、城市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 0.6%，而且城市与农村、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差异较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移动，据统计 1982 年的流动人口约三千万人、1995 年增加到八千万人、1999 年超过一亿人、2005 年达到一亿五千万人，流动人口的剧增引起了城市化比率的急剧上升（从 1978 年的 17.9% 上升到 2006 年的 43.9%）。这一变化使技术、知识、思想、商品、金钱、语言、文化等各种客体和主体在城市化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速度流动。这些流动促使了文化输入和文化输出，从而促进了语言文化的交流。在语言文化交流中，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语言相互接触，从而在语言结构和语言功能上发生变化。

语言接触是在人类语言产生、发展的进程中带有普遍性的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发展不仅与语言本身有关，还与一个社会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包括历史和人口）、社会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宗教意识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本文以城市化比例列入全国前 10 位内的新疆为例，从广义的语言接触的视角讨论维吾尔语和汉语的接触对维吾尔族生活语言产生了何种影响。为了了解维吾尔族居民的语言使用实况，笔者在乌鲁木齐市南北区的住宅区做了访谈和观察。访谈、观察对象是小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及同居的其他家庭成员。

调查研究表明，不管是维吾尔族儿童还是成人在日常生活中，根据个人的需要，自由地运用着汉语借词或语码混用。维吾尔语和汉语的接触虽然是语音和词汇等表层结构的接触，但其接触对维吾尔居民的思维方式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在吸收汉语借词的同时，也不断地吸收着汉文化，而固有的一些民族风俗、民族礼仪在日益退化。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不可能孤立于社会之外，必然与社会文化发生关系。

目前城市化的发展水平保持着年 1% 的成长率，有学者认为这发展势头今后 30 年间还有持续下去。人类无法阻止也不可能阻止城市化进程的发展、逆转时代的潮流，人们生活语言

也会不断受城市化的影响，其变化的规律需要去不断地调查研究。

企业身份的全球本土化

谷小娟

对外经贸大学英语学院

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发展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商品成为‘伪劣’、‘廉价’的代名词。近些年，中国试图改变‘中国制造’的形象，塑造‘携手中国制造’，乃至‘中国创造’的形象。90年代以来，面临外来品牌的竞争压力，中国涌现出一批民族企业，有些甚至走出国门，在国际市场拼得一席之地。为打入国际市场，获得知名度，这些企业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其中一方面表现在企业标志的设计和修改、网络主页和广告设计，打造企业的全球化身份。本研究以中国十大出口品牌为例，揭示企业身份的多模态构建。

对于企业标志，采用图形、语码(英文、双语、语码混用、汉语拼音、英文字母，等)、富有文化代表意义的颜色等方面进行多模态分析；对于网络主页，进行语码、图片/视频、颜色、布局等分析；对于广告，则重在人物国籍、道白、字幕、背景、背景音乐等的符号意义分析。

对抗负面国际偏见，中国新兴出口品牌通过这些视觉、听觉意象，建构了多维企业形象：国际化、活力、进取、以人为本、和谐，等等，其中以‘国际化’与‘本土化’双重身份为根本。一方面，诸如英文解说、英文字幕、首字母缩略、外国人形象、外国背景音乐、国外城市生活背景等元素，显明企业向国外受众语言和文化调适所做的努力，旨在提高品牌在国外的知名度、赢得国际市场消费者的赞同，同时用以描绘企业的全球化形象。另一方面，本土文化元素，例如汉字、拼音、中国红、地标建筑等，体现对于民族文化、中国经济发展的自豪感和本土身份认同。‘国际化’与‘本土化’双重身份协调发展，互为增益。本文研究方法采用多模态符号分析法，结合人类语言学的内部人评述视角。

关于城市语言调查的几点思考

郭骏

南京晓庄学院院长办公室

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也对城市语言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的加速，普通话使用频率的提高，城市方言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濒危。近年来一些学者针对城市居民的语言使用状况、城市居民的语言态度、城市方言的濒危状况等问题深入城市社区开展调查研究，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但我们发现这些研究在调查对象的选择、调查材料的分析与调查方式的采用等方面存在着一些不足，必须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否则会影响和制约城市语言生活问题的研究。

1、调查对象的选择：(1) 未成年人与成年人。许多研究者只是对中小学生开展问卷调查以期调查清楚城市居民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其结论固然也能反映一定的实际情况，但具有较大的片面性。应该对中小学生与成年人开展综合调查，这样得出的结论才具有全面性，才能科学地揭示城市居民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之客观实际。(2) 本地居民、外来居民与流动人口。事实上本地居民与外来居民、流动人口在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方面存在

着很大的差别。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对城市居民开展调查时需要区别对待，不能笼而统之，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揭示出城市语言生活的实际状况。

2、调查材料的分析：（1）**年龄级差与代际差异。**在对中小学生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调查问题上要注意区别年龄级差与代际差异。青少年在普通话使用问题上所存在的差异是年龄级差而不是代际差异。（2）**语言认同与语言使用。**一般来说对某种语言的认同度高，那种语言的使用率也应高，但不能一概而论。如在方言与普通话使用问题上两者就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大多是一个认同度高，一个使用度高。已有研究表明，城市本地居民对普通话的认同度均高于本地方言，但在使用上却是本地方言的使用率高于普通话。

3、调查方法的采用：目前国内学者对城市语言生活状况的调查大多采用问卷调查法，但此法调查所得出的统计数据很难准确地揭示城市语言的使用实态。对于公共领域语言使用状况的调查，我们可以借鉴境外常用的非介入式观察的方法，深入调查实地，隐蔽观察并记录公共场合的语言使用状况，揭示使用实态；对于私人领域语言使用状况的调查，我们可以采用参与观察的方法，克服“观察者的矛盾”，观察到自然的语言状态。总之，我们对于城市语言生活的调查不应只采用一种方法，而应采用多种调查方法，方能揭示出城市语言生活的真实状态。

网络是语言创新的重要基地与助推器

郭龙生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网络自产生以来，在语言文字的应用方面引起了学界和广大民众的诸多议论。褒贬有之，毁誉参半。然而，随着网络日益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网络语言对社会语言生活的影响作用也日益显著。网络正逐步成为语言创新的一个实验平台，成为语言创新的一个主要助推器。

文章通过分析自网络产生以来社会语言生活方面所发生的变化，结合新词语的产生，结合新的语言现象的出现，论述了语言创新与网络的密切联系，充分说明了网络在社会语言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论证了网络语言是语言创新的重要源泉，网络是语言创新的重要基地之一，是语言创新的重要的推进器。

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的隐喻研究

郭松

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尽管批评话语分析领域发展迅猛，但其对话语参与者认知过程的忽视却长期以来为人诟病。作为人类概念化世界的基本认知工具，隐喻在构建社会现实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隐喻提供了观察现实的特定视角，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不仅要重视隐喻的认知功能，同时也要研究其意识形态与社会功能。隐喻研究可以与批评话语分析有机整合，进一步丰富后者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手段。

多模态语篇中的框架和图形-背景结构

--- 以对 Simmons 珠宝公司的一则广告分析为例

和媛媛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框架”除了其在词汇语义学、句法语义学和篇章语义学等领域的应用，还可以成为进行多模态话语分析的有效工具。本文在框架语义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 FrameNet 工程的研究成果，尝试将“框架”纳入多模态话语分析的可行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文本中的图形-背景结构。文章取美国 Simmons 珠宝公司的一则商业慈善广告为例，首先对该广告的语言文本中能够激活框架的“中心词汇”(lexical heads)及相关“框架元素”(frame elements)进行了分析，并进而论述了在该文本中被激活的框架及其之间的关系。其次，对文本的图形-背景结构进行了阐述并基于前文的框架分析探讨了图形-背景结构同框架之间的关系。文章最后得出结论：利益方可以在生成多模态文本的过程中巧妙运用语言、图像等符号手段去激活并凸显特定的框架以引导受众对文本的解读并进而影响受众行为。

蒙古语科尔沁方言的形成演变与人口迁移流动

红莲

内蒙古民族大学传媒学院

人口迁移流动现象与语言现象同属于社会现象，也可以说是同步进程的社会现象，从而人口迁移流动现象是影响语言变异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蒙古语科尔沁方言的形成与演变，就是不同社会历史时期人口迁移流动的结果。社会人口环境不断变化与不同语言方言之间的接触影响赋予了科尔沁方言生命力和挑战力。从科尔沁地区的人口迁移、流动、变化等视角来探究科尔沁方言的演变进程，我们不难看出它有着三条主流变异线，一是，向满语靠拢；二是，向哈喇沁方言靠拢；三是，向汉语靠拢。当今，汉语的影响是最为严峻的，最为挑战性的。

网络流行语使用中的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差异研究

胡安琪

青岛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本研究的目的是调查网络流行语使用中的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差异。以语言变异和语言变体为前提，以言语社区和言语接触理论为基础，本研究首先通过网上调查收集到当前最为流行的 20 个网络流行语并制作了问卷，然后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对 20 的流行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随机的社会调查。被调查对象共有 190 人，其中男性 100 人，女性 90 人，年龄均在 12—50 岁之间；学生和上班族居多，自由职业者为少数；受教育程度不等。研究结果显示，流行语的使用现状在性别差异方面呈现出趋同化；而在年龄差异方面则呈现出低龄化趋势。教育程度这一社会变项较为显著地影响了中年人对网络流行语的使用。身份对于网络流行语的使用没有显著影响。基于对研究结果的分析，文章指出由于网络流行语特点的多样性，青

少年心理特征的复杂性，而青少年又恰恰是网络流行语使用的主力军，流行语使用的性别趋同化和低龄化提醒人们，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不仅仅是学校教育的任务，也是全社会的任务。因此，对网络流行语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和对语言使用进行适度规范亦是一种必要任务。

大学生使用字母词状况及态度调查

胡逸君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字母词 (lettered-word) 指含有字母的词，是现代汉语中的外来语现象。已有研究多从语言本体角度出发，研究其含义界定，语法规则、读音特点及使用规范，但较少研究涉及大众对字母词的使用态度。大学生作为文化先锋以及语言发展态势的引领者，他们的语言态度往往对社会语言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出发，展示正在大量使用或传播字母词的大学生对其的真实接受程度是有意义的。本研究期望通过对大学生在字母词上的态度调查，为语言使用和语言规范提供参考，从而使社会语言的生动活泼更具理性依据。

本研究中涉及到的字母词涵盖四种类型：纯字母词，如 CDMA, ICBC, GRE, PK 等；汉字字母词中，如 POS 机，ID 号，APEC 会议，IT 产业等；数字字母词，如 3D 等；以及，数字、字母、汉字混和字母词，如 3G 网络等。

研究主要采用调查问卷及访谈的方法，向北京师范大学 400 名本科生发放了调查问卷，并收集了受访人性别、高考所在地区、年级、专业、英语水平、平时每日上网时间以及平时上网的主要目的等信息。调查问卷首先通过连线题的方式，考察大学生对于 9 个字母词的认知。在字母词使用偏好和频率的题目上，则采用了情景选择题的形式。最后，通过改编自利克特 7 点量表的 6 点量表，考察了大学生对于字母词优点、局限和缺点的态度，字母词对于自我认同建构的态度，对于字母词主、被动使用的态度，对于字母词的个人态度，以及对于字母词与中文关系的态度。本研究的访谈是半结构式的，旨在了解大学生对于字母词的认知情况、使用字母词时的心理感受等。

经 SPSS 和 Excel 等工具分析调查结果，本研究发现，语境对于大学生使用不同形式的字母词（单个字母词、字母词加中文注释、中文注释配有字母词）有很大影响。大学生认为，日常对话时使用单个字母词最为恰当；在课堂中，老师直接说字母词是最能被接受的；在网络写作中，大学生最经常自主使用字母词。

大学生对于字母词的态度较明确，既肯定了其在表达、沟通上的优势，同时也认识到字母词形式的局限和表达的不足。在使用上，被调查的大学生显示出既不保守，也不过分崇洋媚外的态度。调查中发现，多数人肯定了使用字母词时尚，能够显得和国际接轨程度高，表现出一定的从众心理。但同时，也有很多被调查者表示，字母词虽然能够弥补中文的一些表达局限，但并不能明显地丰富中文。在字母词的主动使用和被动接受的态度上，受访者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偏好。以上调查结果显示了大学生对于字母词这一新兴语言现象的辩证态度。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言语人特征刻画与身份鉴别

黄文林

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研究语言使用中因地域、性别、年龄、阶层、行业、文化程度等因素的不同而产生的语言变体，是社会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分析书面言语证据，挖掘言语人的性别、年龄、地域、文化程度、职业等特征，进行犯罪嫌疑人的特征刻画与身份鉴别一直都是公安机关刑事侦查和物证鉴定的重要任务。当前我国仍处在社会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时期，公安机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任务十分艰巨，犯罪嫌疑人特征刻画与身份鉴别的侦查和鉴定需求仍比较迫切。作为我国公安机关最高检验鉴定机构——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的文检研究人员，笔者一直致力于书面言语证据的言语人特征刻画与身份鉴别的实战及科研工作。

本文首先以笔者经手的多起书面言语证据分析实际案件为例，系统总结刑事侦查和物证鉴定中言语人特征刻画与身份鉴别的分析方法及原则；其次结合美国 FBI 法庭科学实验室近年同类案件的处理现状和学科发展情况，以及信息化对传统书面言语证据分析产生的巨大影响，综合分析当前我国公安工作中言语人特征刻画与身份鉴别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最后，尝试在社会语言学视角下，对言语人的特征刻画与身份鉴别进行全新观照，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以期引发社会语言学家对刑事侦查和物证鉴定领域中言语人特征刻画与身份鉴别的关注和深入思考。

从李宇春的电视访谈看转型时期我国性别文化下的女性形象

黄英姗 陈春华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社会性别理论认为，女性是由文化构建的。“女人是变成的”这一历史名言，极力强调了文化对女性的构建作用。从性别视角而言，女性是由性别文化塑造的。性别文化指的是由社会或某一些人共同承认的有关性别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性别文化对女性的塑造是通过女性形象的构建来完成的，女性会根据性别文化所规定的形象引导、规范、调适自己的行为。而李宇春，最为近年来最为炙手可热的女明星，正是以其独特的“中性”风格，颠覆了当今社会下的性别文化对女性形象的构建。在这讲求“女性美”、肉体“性感”的年代，她选择了对其背道而驰，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本文选择了她于 2007 年接受湖南卫视《天下女人》栏目专访时的话语文字资料，使用 Van Dijk 提出的批评话语研究手法对其进行分析，旨在总结出社会转型时期我国性别文化下塑造出的基本女性形象特征。

“非方言族”对本地方言使用和发展的影响

——以太原市的个案研究为例

劲松 马璇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非方言族”是指在方言地区出生但获得（acquisition）的第一语言不是方言而是普通话的群体。这是一种新生的语言获得和应用现象，在大城市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具有一定持续性的发展趋势。“非方言族”的形成和发展直接关系到普通话的推广和使用以及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方言的保护。本文通过社会语言学的调查，探讨“非方言族”的性质、语言状态、形成的原因及其对当地方言使用和发展的影响，以期对普通话和方言的和谐关系进行科学和正确的认识，探索解决对策，为制订语言规划和政策提供现实和科学的依据。

从造词法看年度媒体新词语的戏谑风格

康晓娟

北京华文学院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1年》公布了2010年度媒体新词语表。这些新词语，在准确客观地描述了年度社会生活的新事物、现象的同时，也表达了造词者和使用者对该事物、现象的态度，体现了造词者善于通过语言提炼生活、揭露本质的智慧。本文从造词法的角度，对2010年度媒体新词语表的500个词语进行了分析，归纳出媒体新词语的8种主要造词法。分别是：1、缩略法。如巴比、摩女、森女、悲催、果粉、压力面、超导等；2、比喻法。如玻璃门、零帕、橡皮人、筷子路、僵尸粉、地板工资、树官等；3、谐音法。如蒜你狠，豆你玩，苹什么、柜族、杯具、油你涨、煤超疯、足囚协会等；4、翻译法。如拜客、欧猪五国、悦活（查一下）、就书、闹太套、灵猫六国等；5、昵称法。如犀利哥、淡定姐等；6、借代法。如北约、华约、春晚钉子户等；7、仿拟法。如黑飞、媒治、裸晒、裸帐、团奴、赖班、学模、刷二代、吸费门、乐价比、绿价比、微……、词媒体、……奴、尿点等；8、连绵法。如楼超超、楼挤挤等。这些分类彼此也有交叉。

以上造词法产生的新词语，都带有不同程度的戏谑色彩。戏谑，即调侃，指用有趣的话开玩笑。如缩略法中，“巴比”一词，由“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两个人中文音译名的首字组合而成，恰巧又与“芭比娃娃”同音，就有了较强的幽默效果。又如谐音法中的“煤超疯”“蒜你狠”，分别由武侠小说人物“梅超风”和俗语“算你狠”演变而来，生动描述了煤炭及煤炭股票、大蒜价格上涨的现象，具有十分浓厚的讽刺意味。而这种戏谑风格产生的效果也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从语言学上看，印证了“修辞学造词法”的存在意义，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展现和增强了汉语的活力；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戏谑化的词语，更容易被读者记住，推动人们对某一社会现象的关注度；戏谑不同于直接的批判或赞扬，在交际过程中有冲淡事物、现象本身严重性的作用，戏谑风格能被广泛使用和流传，说明了这一时期某些特定的社会心理。

中国环境话语六十年之变迁

李昊平

天津外国语大学

批评话语分析的一个研究方向就是社会变迁中的话语研究。环境话语体系制约着我们界定、解释和应对环境事务的方式，是维系环境机构事务运转的核心。本文考察了《人民日报》62年来与环境相关的新闻文本，以语料库技术的统计数据为切入点，以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主题词、词频、搭配、词丛、语义韵等方面展现不同时期环境话语典型的语言形式，分阶段、多方位地考察环境话语在当代中国的阶段性特点、变化机制和变化轨迹，聚焦不同历史背景中话语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在探讨话语和相关社会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同时，呈现问题的历史渊源。

方言进入基础教育之利弊分析

李佳

武汉大学文学院

近年来，在方言与普通话关系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建国以来未曾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方言进入基础教育即其中之一。所谓方言进入基础教育，仅指课内方言教育，不包括课下或课外涉及方言的言语行为，后者属个人语言权利范畴，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到各地的实施办法，对此均未做任何限制。而需要指出的是，教育主管部门以官方文件形式推动的、在课下或课外实施的涉及方言的活动，均应视作课内方言教育。

我们集中考察了闽南、闽东、苏南三地方言进入基础教育的情况，发现三地的发展模式具有很强的共性：早期均由民间自下而上发起呼吁，到一定阶段复由政府主管部门自上而下加以推行。对此现象，三地地方媒体言其利者占压倒性意见，其中又以有利方言保护、文化传承之说最为常见。我们认为，对其利弊应辩证加以分析。

方言进入基础教育之利，除地方文化因素之外，尚有：

（一）通海峡两岸之交流。在闽南地区，满足对台交往需要是推进方言进入基础教育的最大政策面因素，厦漳泉三地教育主管部门发布的推进闽南方言进入基础教育的文件中，几乎都有促进海峡两岸交流的表述。

（二）促新老市民之和谐。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人口流动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外来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新老市民不可避免地发生经济利益的竞争甚至碰撞，久而久之，这些碰撞就会在文化心理上得到表征，方言于是成为将这一文化心理进行外化的最简便的手段。让外来人口子女从小学习本地方言，对疏解新老市民矛盾具有积极意义。

（三）谋普方关系之互动。普通话与方言一直存在互动，普通话对方言施加影响，方言也在不断丰富着普通话。因此，基础教育阶段的方言教学，不仅能对普通话自身的丰富起到一定作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拉近方言与普通话的距离，从而达到二者的良性互动。

凡事皆有正反两面，方言进入基础教育之弊，我们认为至少有以下三点：

（一）对地位规划之冲击。在方言教育实施过程中，有媒体、甚至学者将方言学习等同于外语学习，把普通话与方言并存的状况类比为瑞士、新加坡等国多种语言并行的状况，这类指导思想具有很强的误导性。如不注意及时引导，潜移默化之中可能会对现有语言地位规划造成冲击。

(二) 对儿童习得之干扰。厦门、苏州两地都将方言教育延伸到了幼儿园,而幼儿处于母语形成的关键期,方言对普通话习得的负迁移作用不容忽视。

(三) 对汉字规范之影响。东南方言中有音无字的现象十分普遍,对此学界一般有三种处理方式:考本字、同音字或训读字替代、画框阙如。如将这三种处理方式的任何一种引入基础教育,都有可能会对现行教育汉字规范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方言进入基础教育的呼声绝不仅限于闽南、闽东、苏南三地。如2011年年底,上海语言学界82位教授学者联合发表的《关于科学保护上海话的倡议书》提出:

“学校老师应积极引导和鼓励学生在下课说上海话,每周要安排时间辅导幼儿园孩子和小学生讲好上海话。……要组织开展全市性的中小学生上海话使用的比赛活动。”

这些建议显然需要通过教育主管部门才能施行。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全面评估、扬利避害,寻求基础教育阶段普通话与方言关系的最佳平衡点,尚需大量研究提供支持。

孔子学院与海外华文学校的整合与互补

李嘉郁

北京华文学院

自2004年起,孔子学院(包括孔子课堂)在全球迅速布点,其对于海外汉语教学事业的推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其中既有客观环境的制约,也有我们经验不足、认识不到位的因素。

作为国家支持的孔子学院,资源丰富,这与华文学校人、财、物力的普遍匮乏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华文学校历史悠久,根基深厚,立足华人社会,具有谙识当地形势、办学经验丰富等天然的优势,二者之间有着相当强的互补性。

进行汉语国际教育,增强中国软实力是孔子学院最核心的任务与使命,而遍布海外的中文学校已经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国家政策而言,二者应是中国形象建设的一体两翼。实际上,孔子学院的设立对当地的华文学校具有双重的影响,即可和谐共赢,也可能相互制约。要求从国家层面对二者进行资源整合优势互补的呼声在华教界尤为高涨。

本文即着力探讨如何立足当地,实现国家资源在孔子学院与华文学校之间的合理配置,从而推动国际汉语推广与中华文化传承的有效进行。

研究的主要内容为:从国家政策层面阐释软实力培育的一体两翼即汉语国际推广与海外华文教育的关系问题;考察孔子学院目前存在的问题;分析华文学校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所具备的条件;对双方的协作互补提出可行性意见。

山西省都市语言使用状况调查研究

李伟

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在普通话大力推广的情况下,山西都市语言使用状况究竟如何?目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人们的语言态度怎样?针对这些社会热点问题,我们对山西省11个市——大同市、朔州市、忻州市、太原市、阳泉市、吕梁市、临汾市、长治市、晋城市、运城市——人们的语言状况进行科学的实地抽样调查。

通过此项研究我们发现：当前山西都市语言使用面貌不一。大多数人已经具有了双方言能力（方言和普通话），但是人们对于方言和普通话的使用能力和程度不一。普通话态度、普通话教学程度和普通话使用成正相关。省会城市和比较开放的城市，人们的普通话意识比较强，普通话使用范围比较广，普通话亦较为标准；但是地理位置比较封闭的城市，方言仍旧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总的的趋势是：人们对于普通话的认可度在提升，说普通话的意识在加强，说普通话的质量也在逐步提高。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在语码转换过程中，方言和普通话并非是一种简单的替代关系，更多的是一种相互杂糅的语码状态：方言存在着向普通话靠拢的变异形式，但又保持着自己的特色。

本文在总结以上各种问题的同时，积极思考当前普通话普及下的方言变异规律，并探讨如何解决语言规划与语言教育、语言经济之间有机结合等问题。

军人身份构建的话语特征分析

李咸菊

特种警察学院训练部语言教研室

身份是人在不同语境中展演合乎规约的语用行为的结果，人的身份可在语言的选择过程中构建。军人具有相对集中又独特的文化、习惯、规约、思维方式、道德和价值观念等，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原则性，以及既维护权势又讲究平等、既统一又竞争的地位意识，是个特殊的言语社团，军人的身份通过军事活动及其他社会活动和话语实践得以表征，在军事活动及其他社会活动和话语实践中进行建构。

本文通过对军人话语中词汇选择、常用句式、语调变异、语体选用以及称谓（含自我称谓）、情态语、礼貌原则和话语交换结构等进行描写、分析，揭示军人身份建构的话语实践及其语言运用规律与特征。如运用比较专业的军事专业词汇、比较制式的句法、程式性的语篇结构，用一种概括和抽象的方式来区别于其他身份的人们，清楚地显示政治立场、军人身份及具体职位等。具体如军人在一些正式的集体活动场合的口语交际，通常按一定的程式和风格进行表达；书面交际常使用规范的军事术语、大量出现以“必须”、“应当”、“不得”、“严禁”等词语及其限制对象所组成的祈使句以及其他形式的祈使句，以充分表现话语内容的约束力和警示力，凸显严格规范、高度统一的军事行动和令行禁止的军人言行举止特征；并列结构的话语形式，整齐划一、概括简洁、讲究韵律，语用上形成刚劲有力、庄重威严的效果；语篇结构也具有较强的，另不同等级的军人在称呼语、应答语、报告语和问候语等方面选用也不同，以表明自己的具体身份，如使用俗语、显示干练、果断、直率的军事指挥官身份。

英语外来词的语义和词形汉语化研究

李晓娜

河南省南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外来词在融入汉语的过程中，无论形式上还是意义上都会发生变化，这是受特定系统关系制约的必然结果。外来词融入现代汉语，并成为汉语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这种现象及其过程称作“汉语化”。外来词的汉语化包括语音、语义、语法及词形的汉语化，本文将从语言学、语用学的视角对英语外来词在词形和语义方面的汉语化进行分析探讨，提出外来词的深度汉语化问题，并初步刻画深度汉语化的途径和方式，同时从认知等角度对外来词汉语化现象作出一定的解释。

英语外来词的词形汉语化主要表现在：1. 音节结构；2. 语素化；3. 词缀化等。英语外来词的语义汉语化主要表现在：1. 多义的单文化；2. 所指的偏离；3. 色彩的偏离；4. 语义关系的调整等。

美国双语教育政策：团体之竞争

李艳红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摘要：就语言权利来说，美国的历史也是一部与多语多文化抗争的历史。美国双语教育政策从19世纪至今，经历默认、限制、复苏和僵持的循环发展。每一阶段的变迁都反映了美国各利益集团和各阶层不同的种族意识、教育意识和语言意识，促使各级政府制定不同的双语教育政策。研究通过对美国移民教育史、语言生活、官方双语教育政策的解读，探索了美国双语教育传统的延续过程。研究发现，美国双语教育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经历了发展、重建、再发展的变迁；双语教育传承形式经过三次范式转变，即“双向模式”到“过渡模式”再回归到新形式的“双向模式”；美国的语言政策并没有因为《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的出台而走向所谓的单语制。虽然双语教育政策几经变迁，但是在多语多文化语境下，双语教育传统一直在延续。受“唯英语运动”影响，以加利福尼亚为代表的一些州放弃了双语教育，但以德克萨斯为代表的移民州仍然保持着双语教育传统。双语制还是单语制，是各利益团体对政府、民众的影响力的实现。

网络调侃语简论

刘楚群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拟对近年来网络上流行的调侃语的内涵、特点、生成机制等问题进行深入探究。

一、网络调侃语的内涵

网络调侃语指近年来在网络上大量出现的搭配新奇、风格幽默、表义独特甚至出人意料的一类话语。从语法形式看，主要包括四种类型：词，短语，句子，句群。其整体风格是调侃，但表现方式多种多样，有的使用修辞格，使平常的内容获得强烈的表达效果；有的进行超常规的语法组合，获得视觉的新鲜感；有的内容平实直率，但一语道破天机；有的思想深邃高远，发人深省；有的则纯粹搞笑，使人难忘。如：

- (1) 神马都是浮云。/ (2) 羡慕嫉妒恨。/ (3) 男人的实力就是你兜里的人民币。
- (4) 那些允许被挥霍的年代叫做青春。/ (5) 距离产生的不是美，是小三。

二、网络调侃语的特点

- 1、选词一般平实而不华丽，其幽默调侃的效果往往来自于搭配的陌生化。
- 2、在流传过程中往往形成固定的话语模式，具有较强的模仿性和再生能力。
- 3、其调侃语义往往依托一定的社会事件或现实现象，而不是狭义的上下文语境。

三、网络调侃语的生成方式

- 1、对某些有较大影响的言论进行无限放大、加工改造，取得哈哈镜一样的幽默效果。
- 2、利用一定手段生成新的话语。大致有六方面手段。

第一, 违背话语心理预期。即语流暗示的语义方向突然改变,使“心理期望的突然扑空”。
第二, 模仿并改造名言熟语, 使语义发生根本转变, 从而产生调侃搞笑的表达效果。
第三, 巧妙变换语序, 组成内容上反差明显的语言片段, 使平常的话语调侃意味十足。
第四, 故意制造哑谜。需要通过对表层形式的仔细解读才能明白其蕴含的深层调侃含义。
第五, 故意忽视词语的本来语义, 立足语形临时赋予其一个不着边际的调侃性新意。
第六, 巧妙使用谐音。以调侃为目的, 利用谐音手段把两个毫不相干的词语联系在一起。

家长投资与初中生英语学习动机：社会阶层视角

刘宏刚
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全球化程度的日益深入, 提升了英语作为文化资本的价值, 掌握英语这种文化资本有可能帮助学习者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 改变其现有的社会地位。在这种背景下, 本研究以布迪厄的资本理论为框架, 选取来自沈阳、南京和北京、盐城市的 15 所中学 1542 名初二年级学生及其家长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以问卷调查为主的量化研究方法, 结合访谈探讨了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初中学生为何学习英语? 这与家长对于他们的英语学习投资存在怎样的联系? 这样两个问题。研究发现 (1) 家长投资观念、行为和学生英语学习动机之间存在线性的影响关系, (2) 家长投资观念、投资行为、学生英语学习动机在不同社会阶层上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认为在社会阶层视角下, 学习动机是一种惯习、具有社会和心理双重属性; 教育决策部门在编写教材、英语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需要考虑社会阶层的因素, 特别要关注下层学生; 家长要注意资本的合理配置和使用, 提高对英语学习的认识, 共同促进学生多元学习动机的形成和发展。

语言市场视野下的察布查尔县锡伯族双语现象

刘宏宇 李雅
新疆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田野调查的数据表明, 察布查尔县锡伯族双语现象与语言市场的形态有密切的关系, 正是语言市场的多种形态造成了察布查尔县锡伯族双语的不同亚形态。这些亚形态的形成也是锡伯族作为双语族群拥有并充分利用语言资本的合理选择, 锡伯族利用语言资本实现了利润的最大化。

母语文化在外语学习中的作用：学习者的观点

刘晓波 战菊
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本研究旨在探讨母语文化在二语习得和外语学习中的作用。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跨文化交际的不断深入和二语习得理论对语言文化的研究在不同层面上广泛展开,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研究开始出现从单向关注“目的语文化”学习转向关注“目的语文化”和“母语文化”的双向互动问题(何自然,1993;王宗炎,1993)。现有的研究认为:1)利用母语与母语文化知识来促进外语学习中有共性的东西的理解和学习,或者通过两种语言中某些相似或相异的东西的比较而加速外语和外语文化的学习(束定芳、庄智象,1996)。2)二语习得研究中的“生产性双语学习”理论认为,母语和母语文化起着积极的作用,该理论强调两种语言和文化价值系统的互动,并最终对两种文化的认识在质量和深度上达到新的认识(高一虹,1994)。3)跨文化交际理论也在强调文化交流的双向性:交流本身是双向而不是单向,交流意味着吸纳和传播,两者缺一不可(Widdowson,1983)。

大学外语教育中的母语文化元素只是在近年来为国内研究者所关注,一般集中在“母语文化”缺失现象的调查,以及对其具体的导入方法上(从丛,2000;张为民,2002;陆全,2004)。总体而言,相关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深入系统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尚不多见。

本文以大学英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和访谈调查汉语文化在他们英语学习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他们的社会心理变化。本研究结果发现,1)英语学习者对母语文化的态度存在差异。2)英语学习者对母语文化在其英语学习中的作用的认知存在差异。3)英语学习者的学习年限、英语水平和其汉语、汉语文化存在正相关。4)大学英语教育中母语文化教育严重缺失。

我们认为应当在大学英语教育中加强母语文化元素,并且在课程设置、教材编写以及教师教学实践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本文的研究对二语习得理论具有理论探索意义,尤其是二语习得中的语言文化迁移理论、语言学习动机理论、生产性双语学习理论具有较高的理论建构价值;本文的研究也可以为外语教育中的跨文化交际教学,为外语教育的合理规划、外语课程的合理设置、外语教材的革新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证数据参考。

大运志愿者的语言态度、民族与国际身份认同

刘毅 邓婷婷

深圳大学

本研究以2011年在深圳举办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志愿者为研究对象,考察他们对世界英语的态度,以及投射出的民族与国际身份认同的动态发展情况。我们结合量化与质化研究,于2011年7月至2011年10月期间,对401名大运会大学生志愿者和154名教师志愿者进行调查。研究方法包括:1)采用五种英语变体录音为刺激材料的“主观反应测试”比较学生志愿者大运前后,以及大运前与教师志愿者之间的语言态度是否存在差异;2)对大运后学生与教师志愿者进行个别访谈,探究大运会对其语言态度及身份认同所产生的影响。

结果显示,学生志愿者对世界英语的了解有限,态度倾向保守,对英美变体的评价远远高于中国英语、美国黑人英语和印度英语。在情感投射层面(主观反应测试数据),这种取向在大运前后得到持续;在理性表达上(访谈材料),大运后的语言态度呈现出较为复杂和多元的变化。大运前与教师志愿者的数据比较无显著差异,学生与教师的语言态度大体趋同。而两者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在大运中清晰显现。国际公民身份认同亦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语言偏见和文化定型或削弱,或维持,或强化,总体趋势不容乐观。研究表明,学生

与教师志愿者“亲英美，排斥其他”的语言态度与“开放、多元”的追求出现不协调。在世界与英语全球化时代，“同属英语变体，权利地位平等”的呼声高涨，英语学习者需要在日常生活与国际社会交往中以更加包容的态度对待世界英语，加强多元文化意识，培育更加坚实的民族和国际认同。而英语教育者在自身付诸实践的同时，需要为学习者提供更多了解世界英语的机会与帮助。

义乌城市双语建设现状及思考

毛力群

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

浙江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是世界第一大市场，因此义乌有着“小商品海洋，购物者天堂”之美称，成为国际商贸名城。义乌的城市语言生活顺应经济发展的国际化步伐，逐步形成了多语环境下的多元化语言使用模式。城市双语的逐步普及和水平提升，可以充分展示一个城市的人文素养、文化内涵及其国际化程度，因此，加强义乌的城市双语建设是当务之急。文章通过对义乌的城市双语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反映了当前义乌城市双语建设现状，并针对具体调查结果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为义乌的城市发展助力。

2011：微博对语言生活的影响

牟岩 王南冰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微博在为上网者提供自由言论空间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语言的生成和运用方式。毋庸置疑，微博在改变社会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改变着我们的语言生活方式。

一、政务微博：怎样说话需要慎思

2011年堪称中国政务微博元年。

微博时代，政务微博的公文体例和话语模式应有怎样的改变？

目前大多数官博的语言风格仍属官方新闻发布体例，严谨有余轻松不足。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不少政务微博都用上了时尚的“网络流行体”。

还有一些官博，语言十分平实，也很受网民好评。

也有语言很“萌”很“潮”，却引发一片争议的。例如“淘宝体”的通缉令。

不少网民认为，官博要根据工作性质和发布的信息内容来确定语言风格，不能一味追求“亲切”而沦为媚俗、作秀，“怎么说”取决于“说什么”，要审慎使用网络流行语体。

二、微博流行语：咆哮与卖萌

年末，各种传媒纷纷盘点年度热词、流行语。这些流行语浓缩了一年的新闻热点与大小事件，犹如一个个路标，标志着这一年的基本社会风貌以及人们的生存状况。

我们试以其中几组词语为例，略作分析：

1、Hold住与伤不起

这两个词恰成呼应，一面喊着“伤不起”，一面又自我安慰要“Hold住”，透露出一种虽有些无奈却也不乏自嘲的调侃意味。

2、有木有与肿么了

这两个词勾画出的那种懵懂茫然又咆哮求解的表情，实在是2011年国人情绪的典型写照。

3、郭美美：

“郭美美”跟“药家鑫”、“小悦悦”一样，能够造成喧嚣一时的围观和热议，并最终入选年度热词，其实是因为在这些事件背后所隐藏的问题更引人深思。

4、萌、卖萌、治愈系

这一年微博中一切关于“萌”与“治愈系”的内容都得到广泛追捧，“卖萌”则成为一种集体有意识行为。

三、微博体：全民大造句的网络狂欢

2011年，网民以空前的热情将造词发展为造句，新的语体范式迅速从网上扩散到网下，形成一波又一波的热潮。那些用来“造句”的话语模式被冠以“XX体”，统称为“微博体”。

这些流行体，大多采用正话反说或反话正说的方式，用反讽、调侃和夸张的语言去评论事件或人物，借一种貌似玩世不恭的表现方式，巧妙表达了一些不能直接表达的见解和主张，达到批判或嘲讽的目的，语言轻松活泼又不失尖锐，虽然形式上表现出娱乐化特点，但是传达的内容颇具思想性和批判色彩。

四、微博流行语与流行体：特点与影响

（一）2011年微博流行语、流行体的特点：

1. 极具反讽性。
2. 娱乐化、碎片化现象更突出。
3. 萌态十足。
4. 更加夸张。
5. 更具草根性。
6. 符号化倾向。

（二）对语言生活的影响

这是一个语言狂欢的时代，汉语言那种简单搭配、变换组合即可营造出万千风情的宽广与宏大语境，从未像今天这样得到广泛的认识。微博制造了一个真正的“广场”，在“围观”的同时，人们也在戏仿、自嘲和批判着。

Facing the World & Constructing the Sel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of Chinese Internet Users

聂 隽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Far from being a well-defined and static concept, “national identity” can nevertheless be approached from the spirit, emotions and ideas that its individuals hold collectively towards a nation. National identities are, from a social 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 “discursively, by means of language and other semiotic systems, produced, reproduced, transformed and deconstructed” (De Cillia, Reisigl & Wodak, 1999: 153). In such ligh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online discussions about two consequential events in China (i.e. 2008 Beijing Olympics and 2010 Shanghai Expo) from three major international social websites, which were continuously collected over two years, and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the Chinese users’ national identities embedded and implied in such intercultural interaction in the medium of global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 In

methodology, this study incorporates an adjusted framework of speech act theory with discourse studies on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categorize and analyze all the collected data. On the one hand, 12 primary *speech acts* were generalized by a thorough linguistic parsing of the data, which sequentially and/or collaboratively formed 19 major *types of exchange* by the Chinese participants; while on the discursive level, the agents (identities) of these speech acts were discussed and highlighted, yielding 37 major types of *national identities* of the Chinese users.

Findings showed that distinct types of Chinese participants' exchange behavior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iated by the *underlying addressees* and *imagined audiences* of each and every speech act produced, e.g., whether a comment was self-initiated, directed to a certain audience, or directly responsive. These features largely correspond to extant historic, political or sociological studies, which regard Chinese nationalism as generally "inward-directed" (Comaroff & Stern, 1995) yet is predominantly manifest in "instrumental and reactive" (Zhao, 2000) circumstances. Detailed analysis further revealed five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s regarding how the Chinese participants constructed their national identities with various communicative strategies, such as 1) deliberate management of addressee and audience directions, 2) abundant use of expressive speech acts, 3) strong inclination to refute, 4) marked difference in attitudes towards compatriotic and out-group audiences, and 5) collective effort in 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presence globally. By virtue of these communicative means and strategies in global CMC, the Chinese participants demonstrated conspicuous national identities that were oriented to and aligned with certain ideologies and socio-cultural aspect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The present study uncovers global CMC as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Chinese citizen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more importantly, for their demonstration and consolid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ies, especially pivoted around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ssues. These findings can make meaningful dialogues with previous research on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the "online public sphere" (Dahlberg, 2001) in promoting public thinking and conversations, and also provoke further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line discourse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for Chinese Internet users.

非洲诸国语言的本土化与全球化

潘海英¹ 李菲²

1.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2.吉林大学文学院

非洲的语言语种语族众多，保留着世界近半数的语系。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目前在非洲使用的语言有2000多种，占世界语言总数的30%。在非洲的本土语言中，有的使用者有数千万之多，有的使用者才几百人以下，其中很多为濒危语言。非洲语言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与其社会的历史发展、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密切相关。目前非洲各国的语言深受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语言政策的影响，语言本土化、国际化与全球化日益成为问题的焦点。

本文内容主要有四部分：1、非洲国家的语言概况。2、后殖民时期非洲诸国语言政策的特征。3、非洲诸国语言的本土化。4、全球化进程中的非洲语言。

第一部分 非洲国家的语言概况

非洲的语言情况十分复杂，如果把非洲当成一个整体，就居民的数量同语言的数量相比，非洲是世界上语言最多样化的地方。非洲有大量本土语言，同时又在殖民时期建立了欧洲语

言的上部结构 (superstructure)，这些都使非洲语言的整理和研究更加复杂化。本部分将简要概述非洲语言的分类、分布和语言使用的特点。

第二部分 后殖民时期非洲诸国语言政策的特征

非洲诸国的语言政策深受殖民时期语言政策的影响。在后殖民时期，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非洲各国愈来愈重视语言和文化认同的问题，开始寻求去殖民化，在语言政策上多倡导语言多样化和本土化。非洲诸国在后殖民时期的语言政策呈现如下特征：一是原宗主国的语言在非洲国家官方语言中仍占主导地位；二是很多国家开始尝试语言多样化；三是众多国家开始重视语言本土化，并尝试将之纳入教育体系。

第三部分 非洲诸国语言的本土化

非洲各国的语言本土化与其去殖民化紧密相连，其语言政策的发展大多面临本土化与国际化的矛盾。非洲的发展、文化的认同要求语言的本土化，即本土语言的使用。一方面官员、精英们强调本土语言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们却认可英语在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性，将其子女送到英语学校就读深造。普通民众也认为懂英语有利于他们的就业和改善生存环境。本部分将以津巴布韦和喀麦隆为例，介绍非洲一些国家在去殖民化过程中语言本土化所面临的困境以及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第四部分 全球化进程中的非洲语言

在全球化进程中，因其经济发展的需要，非洲的本土语言或许会真正受到重视。非洲许多国家在语言政策和规划上开始日益重视多样化和本土化的统一，但受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制约，本土语言依然前景黯淡。本部分将从语言经济学的视角着重介绍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非洲一些非英语国家在教育领域倡导和实施语言本土化所做的一些努力与尝试。

结语：

非洲存在着世界上数量最多、使用最为复杂的语言，需要进一步对其进行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同时非洲深受殖民地时期语言政策的影响，其语言发展中一直存在着国际化与本土化、全球化与民族同化的冲突。了解非洲语言政策与规划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制订我国的语言政策与规划。

QQ 签名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潘红彦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把搜集到的语料从形式和内容等方面进行分类，接着探讨 QQ 签名的特点，然后从语言本体角度进行分析。本文着重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对 QQ 签名进行探讨，探讨 QQ 使用者的年龄、性别、职业和文化程度等对 QQ 签名的影响，并分析其所蕴含的社会和文化心理。

大运会教师志愿者的语言态度调查

史咫阳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志愿者作为大运会志愿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语言态度、跨文化意识以及民族身份认同在本研究中起到了不可忽略的参照作用。基于量化与质化的研究，我们于2011年7月至

2011年10月期间，对154名教师志愿者进行了调查。研究方法包括：1) 采用五种英语变体录音为刺激材料的“主观反应测试”调查大运前教师志愿者对语言变体的态度；2) 大运后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对教师志愿者进行个别访谈，探究其语言态度、跨文化交流活动的经历和身份认同、变化及其对世界英语教学的认识。

通过与学生志愿者的数据比较表明，教师与学生的语言态度大体趋同，内圈英语的辨识度普遍高于外圈英语。大运后的理性表达（教师访谈）显示教师志愿者对世界英语的语言态度呈现多元化趋势，且在语言偏见和文化定型上显示出一定的矛盾性。如：在标准英语与非标准英语的看法上，超过50%的教师志愿者持‘难以界定’的模糊态度，但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则又显现出一定的标准倾向。对各种英语变体的语言态度呈现多元化，对中国英语表现出一定的宽容度，但对美国黑人英语和印度英语则有明显的文化刻板印象和偏见。而对世界英语教学与多元文化意识影响的态度则呈现出较为积极的态势。70%的教师志愿者认为有必要在今后的教学中融入各种英语变体的认知。

研究表明，教师志愿者与学生志愿者虽在以“亲英美”为主流的语言态度上有一定的趋同性，但教师志愿者在国际身份认同和文化偏见上均有不同程度的个性化思考。与学生志愿者相比较，教师志愿者更显现出对不同英语变体一定程度的关注和宽容。而作为英语教育者的教师志愿者在自身付诸语言实践的同时，也在考虑如何为学习者提供更多的了解世界英语的机会与帮助。

海西经济区实施先行先试语言政策的战略意义

苏金智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根据国务院的部署，海西经济区要提升改革开放水平，在对台贸易、投资、航运、旅游、邮政、文化、教育等方面积极探索先行先试的合作交流经验。国家语言文字政策如何在这个地区的经济建设和两岸的合作交流中发挥作用，教育部为此在海西经济区的平潭、泉州、厦门等地进行了一次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调查的目的是要了解海西经济区的语言文字使用的实际情况，探索语言文字政策如何更好地为海西经济区服务，推动两岸和平统一大业。本文在介绍这次调查的基础上论述在海西经济区实施语言文字先行先试政策的必要性及其战略意义。

基于微博评论探讨政府微博对突发事件的报道策略

——以“微博云南”报道昆明螺蛳湾事件为例

孙雁雁

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微博与其评论，可构成若干语篇。在这些语篇的形成过程中，有不同的语篇衔接形式。我们以“微博云南”在报道昆明螺蛳湾事件中的微博内容及相关评论为文本，从评论与微博内容的衔接形式入手，运用语篇分析理论及话语分析理论，评析“微博云南”在此次报道中的成功与不足，探讨政府微博对突发事件的报道策略。

此次微博的39条评论，大致以“疑问形式”、“话语标记”、“抽取微博中的词语”、“指

代词语”、“总结性小句”、“相似事件”六种形式引导，与微博内容衔接。不同的衔接形式透露出受众对此次微博的不同态度，大致又可以分为积极、中性、消极三种。积极态度的评论均集中在对微博以政府反应民生这一形式，占评论的 15.4%，大都以“总结性小句”与微博衔接；中性态度的评论占评论的 21%，其衔接形式呈多样性；而 64%的评论对此微博内容持消极态度，大多以“疑问形式”、“抽取微博中的词语”、“总结性小句”三种形式衔接。观察这些负面评论我们发现，受众对此报道的真实性、准确性以及对此报道中政府微博的观点、立场、用词表示不满又占多数。

鉴于此，本研究提出政府微博对突发事件的报道应遵循以下策略：及时性、足量性、准确性、得体性、建设性。由此，政府微博才能真正起到搭建政府与民众之间又一解决问题的桥梁的作用。

“不礼貌言语”的社会语用功能分析

田贵森

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

根据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理想语言交际中要少用、不用或者慎用不礼貌语言。但真实语言交际中有大量的不礼貌用语现象。近年来，已经引起语言学家，语言教师和语言工作者的普遍关注，成为社会语言学和语用学研究的热门话题。本论文将运用社会语言学的理论，特别是功能语言学的观点探究人们为什么要使用不礼貌语言，以及不礼貌语言的主要社会语用功能。

论文首先梳理了不礼貌语言的主要类型和特征，并尝试提出不礼貌语言与不礼貌行为的三种主要对应形式，(1) 常规对应法，指选择不礼貌言语展示不礼貌行为；(2) 超常规对应法，指选择不礼貌言语展示礼貌行为；(3) 反常规对应法，指选择礼貌语言展示不礼貌行为。论文接着讨论并演示了不礼貌语言的三种主要社会语用功能：(1) 直言评价功能，使用不礼貌语言直接表明讲话者的情感和态度；(2) 批评攻击功能，使用不礼貌语言表达对听话者不敬的态度和情感；(3) 隐喻亲近功能，使用不礼貌语言表达对听话者友好，亲近的态度和情感。

论文的主要观点是(1) 不礼貌语言是真实语言交际中很普遍的语言现象，也是语言交际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认真关注和探究；(2) 识别和理解不礼貌语言和不礼貌行为的不同对应方式及意义是一种重要的语言能力和交际策略；(3) 探究人们使用不礼貌言语的原因，使用不礼貌言语的功能和效果，以及不礼貌言语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对认识语言交际中的语用规律，倡导使用得体语言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批评话语分析的社会语言学学科属性的思考

田海龙

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批评话语分析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跨学科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在我国，随着批评话语分析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它的学科属性问题也进入了学者的关注视野。本文从研究实际和理论探讨两个层面思考批评话语分析的社会语言学学科属性问题。

在研究实践方面,我国还没有一个与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特征相适应的备选学科。现在执行的学科分类国家标准共设5个学科门类,58个一级学科,573个二级学科。语言学在该标准中设在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门类之下,为一级学科,下设普通语言学、比较语言学、语言地理学、社会语言学、心里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汉语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外国语言及语言学其他学科共10个二级学科。目前的倾向是,比较多的批评话语分析学者在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时在二级学科一栏选填社会语言学。

在人才培养方面,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2011年共同颁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设有13个学科门类,在文学学科门类中有三个一级学科,分别为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和新闻传播学。在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中,一些学校设有批评话语分析研究方向,或者开设与批评话语分析相关的课程。

在理论探讨方面,已有一些学者认为批评话语分析属于广义的社会语言学。如沃德劳夫(Wardhaugh) (2006)在讨论社会语言学的“干涉主义”时就认为费尔克劳和范戴克的批评话语分析属于广义的社会语言学;费尔克劳(2000)也明确指出批评话语分析是广义的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部分。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索批评话语分析与社会语言学1)从语言研究入手关注语言与社会的联系,进而把社会问题作为研究的问题;2)从研究语言使用者对语言成分的选择问题入手考察话语对社会的建构和参与作用;3)从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中汲取营养,把语言与社会的关系看作动态的、辩证的关系。在对这三方面问题的梳理中思考批评话语分析的社会语言学学科属性。

最后,本文指出,学科的划分与设置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问题。一方面,随着人们对世界(包括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入,学科的区分也会越来越细;另一方面,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各学科需要相互借鉴,形成学科的整合与交叉。而且,作为一种具有规约性的社会实践,学科的划分与设置又是一种权力运作的结果,任何由此而生的“学科分类标准”或“学科目录”都不可避免的带有主观判断,与实际不能完全吻合的可能。

心理治疗与咨询语篇研究: 回顾与展望

田剪秋 高一虹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本文综述心理治疗与咨询语篇的研究,总结现状特点,并展望未来在我国情境的发展。

语篇分析的定义依流派而不同,本文取其广义,指对书面或口头、正式或非正式的言语材料和过程的分析。语篇分析的多种具体理论方法,可以粗略地排放在注重“形式”(如会话分析)和注重“功能”(如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连续统上。

心理治疗与咨询是语篇分析最早得以应用的领域之一。早在七十年代,William Labov就与David Fanshel合作过专著。近二十年来,心理治疗与咨询领域受到社会建构主义和“语言转向”的影响,语篇分析作为一种研究工具被广泛应用。综观心理治疗与咨询语篇的研究,主要采用语用学(包括言语行为理论、礼貌理论、预设理论等)、会话分析、系统功能语言学(特别是语类结构潜势)、语用学与社会语言学对于权势的研究以及话语分析等方法研究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通过意义建构和重构的考察,辨析来访者(病人)的主体性及其转变;2)分析咨询师(治疗师)与来访者的互动,以便洞察咨询关系、评估咨询策略的有效性;3)审视咨询(治疗)中的权力分配和协商,以及咨询在社会文化情境中所强化或改变的价值观。

在我国,对心理治疗与咨询语篇的研究已经有了可喜的起步,主要集中于对于心理咨询

话语结构和功能的考察、咨询双方在互动中的语言顺应现象、咨询话语中的控权和赋权、咨询话语方式的文化背景探讨等。但总起来看，相比国际上的相关领域，研究的规模和深度以及跨学科的结合程度都还较有限。

心理治疗与咨询的语篇研究具有多方面的意义：1) 提供了语言社会生活特定领域的状况描述；2) 推进了语篇分析研究的发展和理论模式的建设；3) 为心理学理论指导下的治疗和咨询的实践效果提供了微观描述证据；4) 将治疗和咨询作为价值观复制或重建的特定社会实践进行批判性的审视。不过，实践应用、理论建设、真实语料的使用与研究伦理的矛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有待突破的问题和局限。

展望未来，我们预测未来二、三十年，我国心理治疗与咨询语篇研究将有较大的发展。在语篇模式概括、人际互动中意义建构的机制探索、实践应用、治疗和咨询语篇在社会转型中的功能阐释等方面，都有望取得可观成果。这一领域的发展，有待社会语言学者的关注、投入，以及跨学科的密切合作。

中介语变异研究综述

田莉

北京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社会语言学，特别是变异社会语言学 (Variationist sociolinguistics) 对于母语社区中语言变异的研究逐渐展开并取得了很大成就。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变异社会语言学开始将其理论和方法运用到了第二语言的研究中，从此掀开了中介语变异研究的新篇章。本文旨在对中介语变异研究进行综述，指出中介语变异研究的重要意义及未来研究趋势。

中介语变异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研究致力于对二语习得者中介语中符合目的语习惯的用法以及不符合目的语习惯的用法进行描述并作出解释。这类研究的因变量通常是目的语中强制性 (obligatory) 的语法特征，即定类规则 (categorical rules) 的研究。其中一个变式是目标语中存在的形式，而另一变式则是目标语中不存在的、二语习得者的中介语中特有的形式，比如，“I no play baseball” 和 “I don’t play baseball”，自变量包括语言内部因素及与学习者有关的社会因素，如年龄、性别等。这种变异的研究被称为 I 型变异研究 (Type1 variation) (Mougeon, Rehner & Nadasdi, 2004)，或者纵向变异研究 (vertical variation) (Adamson & Regan, 1991)。另一类研究关注的是语言学习者对于目的语中本来就有的变异，即母语者在不同的语境中选择使用不同语言形式的现象的习得情况。研究发现，二语学习者要想在目的语中达到较高的水平，除了需要习得定类的语法项目外，还需要习得这种变异模式。这种变异研究被称为 II 型变异研究 (Type2 variation) 或水平变异研究 (horizontal variation)，又被称为社会语言学变异 (sociolinguistic variation)，或语体变异 (stylistic variation) 研究。此类研究的自变量与 I 型变异研究中自变量类似。

I 型变异研究主要集中在语音、动词过去时、名词复数标记等几个方面，主要的研究包括：Dickerson (1974)、Wolfram (1985)、Bayley (1994)、Young (1991)。

II 型变异习得的研究，即母语中变异模式习得的研究已成为中介语变异研究最近的一个重点。二十世纪 90 年代以后出现了许多此类的实证研究，特别是以法语作为第二外语的研究，如：Dewaele (2002), Sax (2003), Mougeon, Rehner, and Nadasdi (2004), Li (2010), Howard, Lemée, and Regan (2006), Major, 2004; Mougeon and Rehner (2009) 等。

中介语变异研究对于我们认识二语习得的过程和本质都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在中介语变

异的统计模式中把说话者的第一语言当做影响因素,详细的语言变异研究可以提供一种测试第一语言影响力的方法。语言变异研究还将增加我们对于目的语的认识,为测量移民融入目的语社区的程度提供一种方法,并为研究学习者在课堂学习正式语体之后的发展情况提供新的思路。

未来的中介语变异研究将会把民族交际学与变异分析结合起来;并对性别所起的作用进行语言学描述,如目的语中的性别差异是否被二语习得者习得?到目前为止,中介语变异研究主要进行的是共时研究,这些数据并不能准确地反映二语习得的过程,因此还需要进行更多的跟踪研究以提供更有说服力的数据。

三峡移民的社会语言学个案考察

佟秋妹

中国计量学院

三峡移民是我国迄今为止动迁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水库工程移民,对我国的社会生活有着重大的影响,它也越来越受到语言学界的关注。语言的变化主要是语言使用者的变化,不同年龄层次的使用者,在语言上的共时差异实际上反映了其语言的历时变化,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我们可以通过对一个家庭的观察来反映整个社会或某个特定群体的特性。

本文以一个移民家庭,共四位成员为研究对象,从语言能力、语言使用模式、语言态度等方面对三峡移民进行个案分析,并希望通过移民家庭中的老中青三个不同年龄层次的成员的语言使用状况的差异的对比,从一个侧面反映整个江苏三峡移民语言的历时变化及其未来发展,并可以此观照其他方言地区三峡移民语言变化状况和发展趋势。

“XX哥”、“XX姐”流行及泛化的多层面分析

汪磊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近年来,随着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和日益普及,网络呈现出许多新兴的语言现象,“XX哥”、“XX姐”、“XX妹”、“XX帝”的流行及泛化即是其中的一种,本文仅以“XX哥”、“XX姐”为例,进行语言学的相关分析。

简单地说,“XX哥”、“XX姐”,是以“哥”、“姐”为定位语素而构成的社会称谓语,如:

“XX哥”类:犀利哥、甘蔗哥、传说哥、力量哥、励志哥、妖娆哥、雪碧哥、母鸡哥、奔跑哥、淡定哥、体操哥、三轮哥、交警哥、虐鼠哥、扔鞋哥、奔跑哥、咆哮哥……

“XX姐”:芙蓉姐姐、石榴姐、筷子姐、青泥姐、失控姐、学历姐、阅读姐、停车姐、奋斗姐、喂奶姐、暴力姐、钢管姐、微笑姐、晕倒姐、凤姐……。

一、“XX”的构成

“XX”多为双音节词语,因此我们以“XX”形式表示,但“XX”不仅仅限于双音节,还有单音节,如“凤”,非音节形式,如“B”。“XX”基本为实词,但词性较为多样,以名、动、形三类居多,名词如“传说、甘蔗、母鸡、雪碧”;形容词,如“犀利、妖娆”;动词如“奔跑”等。“XX”与“哥”、“姐”的组合具有超常搭配的特点,如“母鸡”与哥。

二、“哥”、“姐”的定性

因由“XX哥”、“XX姐”构成的称谓语较多，一些研究者将“哥”、“姐”视为“类词缀”。本文认为，“哥”、“姐”仍为实语素，只是其构词能力较以往大大增强，并在此类构词中为定位语素。“类词缀”的观点会导致现代汉语词缀泛化，进而影响现代汉语构词方式的整体变化。

三、“XX哥”、“XX姐”流行及泛化的动因

此类称谓语主要源于虚拟的网络世界，并影响到网络之外的现实社会。

第一，传播学动因。网络传播的虚拟性和迅捷性，造成事件传播过程中人物身份的不确定性；同时，由于“把关人”的缺失，也使信息发布也“传统”媒体有了很大的区别。

第二，社会语言学动因。性别，即男性和女性，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基本变量，也是人际交往、信息传播过程的身份识别的一个显性因素，是人的最基本的社会标识。“哥”、“姐”的使用就具有此项功能。

以往的相关研究，更加注重语言本体的和社会心理的分析，而缺乏对网络传播特征的认识，因此也未能更好地揭示其流行及泛化的原因。

城市化移民诸变量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王春辉

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

城市化移民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不同语言或方言的接触，接触就会有变异和变化。城市化移民涉及很多变量，比如移民距离、社会网络、移民时间、移民主体类型、移民的职业及经济收入等等，这些变量共同作用从而构成了村民进城的整个体系。本文尝试以社会学视角的城市化移民诸变量为切入点，进而在社会语言学的框架内加以分析。通过对上述五个变量的分析，可以发现：

1) 长距离移民更有助于国家通用语的推广以及某些强势方言的增强，短距离移民则有利于移民方言的保持。

2)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村民的社会关系网络从几乎是强连接(strong ties)的独占鳌头，转向了强连接和弱连接(weak ties)的共同作用。语言变化在社会和地理上流动的人群中比在有强烈当地基础及紧密社会网络的人群中的传播速度要快。社会学家的研究显示，进城村民的社会网络还是以“内向型”的强连接为主，这一情形在一定程度上会有利于其方言的保持，而不是利于方言的创新及国家通用语的使用。

3) 从源居地移出时的年龄越小，越容易出现语言变异及接受新的语言形式。在迁居地的居住时间越长，移民语言发生变异的可能性越大，其向迁居地方言或通用语言转用的几率也越大，其流利程度也越高。

4) 比起同质型聚居区的移民来，异质型聚居区的移民会更易于接受新的方言形式或者出现新的语言变异。

5) 移民所从事的职业的公共性越强，那么越有利于通用语的传播和使用。经济收入越高者，其普通话水平越高，对普通话的态度也越积极。

如果将五个变量做一个合力效果考察的话，那么可以说那些离家较远、弱连接越丰富、期望留在城市、职业较开放、收入较高、异质型居住的移民最易于出现语言变异或者接受新的语言形式。此外，虽然城市化无疑将有助于普通话的推广，而且“城市是文化的中心，是社会的表率，推广普通话应充分发挥城市的辐射作用，由大城市带动小城镇，由小城镇带动农村”，但是就近城镇化、同质型聚居、连续性移民等因素依然会给普通话推广带来或大或

小的阻力。

广告性别隐喻：批评话语分析的视角

王丹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批评隐喻分析”是批评话语分析的一种新方法，它综合运用语料库分析、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分析隐喻，揭示话语群体的信仰、态度和感情。本文以批评隐喻分析理论为框架，通过对广告中典型的性别隐喻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出广告性别隐喻背后的意识形态以及广告人如何通过使用这样的性别隐喻来吸引潜在的买家。

从“科技外语”专业到“商务外语”专业

——三十年来中国高校“复合型外语专业”建构的谱系学考察

王家民

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本文采用福柯(Foucault)谱系学的历史研究方法，以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语篇研究方法为切入点，对三十年来中国高校“复合型外语专业”话语体系建构进行语篇分析与考察，通过追寻分析有关三十年来沉淀下来的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各种话语碎片，考察中国高校“外语专业”话语体系中的常识、共识、惯例等获得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基础与过程。通过对相关历史人文景观的深层梳理、把握、展现“复合型外语专业”知识、话语、权力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揭示该话语体系中被忽略、被遮盖、被隐藏的领域，资以干预中国高校“复合型外语专业”的社会实践。

大学生网络论坛“理工男”身份的话语构建

王荔 黄佩

北京邮电大学

话语离不开话语实践，即根植于社会制度下并受到其影响，带有历史、文化印迹的动态构建，他们不可脱离具体的话语而有意义地存在，同时有意义地表达对身份构建。福柯——造成语言的权力问题研究之人，把意义系统作为权力系统来阐明，把话语、意义与权力联系在一起，动态研究构建的意义。其中身份问题，借意义权利的争夺，在话语的框架中得以解释。“理工男”是在特有教育制度下，由于历史因素，从综合类院校“隔离”出，因大学科目分工需要，一批带有强烈理工气息和有强烈个性色彩的特殊身份群体。传统社会观念下的“理工男”形象——腼腆，木讷，不善交际等特点。自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兴起，大众文化流行，信息爆炸，传统裂变，主体消失，电脑空间和影像扩展，在这样的时代，语言的功能发生了巨大转变，通过语言实践的变化，发明花样翻新的新词或赋予旧词以新的意义，构筑一种新的意义系统。而就在这样的时代，网络提供以个人为中心建立虚拟个人空间的便利，

使得“理工男”这一特殊群体，发现原来的意义系统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于是利用话语重新构建起在网络社区里的新形象。在新形成的社会标签——“宅”“dota”“技术控”等，成为网络时代“理工男”身份构建的关键词，将“理工男”这一群体更加个性鲜明的呈现在网络上。本研究借助布格兰德和得斯勒(Beaugrande & Dressier, 1981)提出的作为“交际活动”的话语分析应具有的七项标准：“衔接性、连贯性、意向性、可接受性、语境性、信息性和互文性。”同时，梵·迪克也提出了对话语进行结构分析、功能分析、解释学和意识形态分析等，以此还归纳出四个分析视角：文本视角、语境视角、风格与修辞视角。其中前两者——文本分析视角、语境分析视角，结合前面提到的七项标准是本研究进行话语分析主要借助的分析方法。文章通过对理工类院校活跃的网络社区——北邮人论坛，选择其中活跃板块，把有关“理工男”讨论的帖子以及用户回复作为话语分析的对象，其中结合内容分析方法，利用关键词的对样本进行分类，分析所得数据，探讨其对“理工男”身份构建方式和影响。

作为社会符号的反语言的社会功能研究

王梅 夏慧言 傅钊
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反语言”(anti-language)这一概念是由著名语言学家 Halliday (1976)首次提出。反语言是一种表达与传统语言意义相反的语言形式，属于社会边缘话语。国内外学者从文学分析、语言特点、身份构建等角度对反语言做过深入研究。本文探究反语言的社会功能，进而促进合理利用语言，引导正确的社会文化价值观。

反语言构建社会现实。反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符号，是在反社会中产生的一种特殊语言形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人的反社会的思维状态及反社会现实。同时，作为一种背离传统语言形式的话语实践，反语言的表现往往是隐性的。

反语言体现对社会等级及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反抗。“反语言不仅是一种相对于主流语言具有不同词汇特征的语言形式，更本质的是反文化(counterculture)群体用来反抗、抵制、扰乱、从而远离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的一种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它是对主导性话语实践以及它所代表的文化与社会秩序的一种反制”(丁建新 2010: 77)。

反语言有助于维系反社会成员的身份认同和群体认同。正如 Halliday 自己所说：“反语言并不是一种娱乐、消遣的方式，而是构建另类的社会现实、实践不同于主流社会的社会结构，构建反社会中的身份的重要手段。面对主流社会的不断威胁与高压，反语言是维系反社会身份和主体性的重要途径”(1976: 572)。

因此，就反语言的社会功能而言，无论是其使用者表达不满、反抗和增强团结的工具，还是其本身能够反映社会问题，进而发挥语言的引导作用，从而建构正确的社会文化价值观，我们都可以发现对反语言有待于更多的研究与挖掘。

香港雇员补偿判决书的语言使用

王培光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

取得 223 份中文判决书，约一百万字作为研究语料，涵盖 2000 年 7 月至 2010 年 12 月

的雇员补偿判决书。以这个语料库进行分析，有三个主要发现。首先，就法律用语而言，香港的一些法律用语不统一，如香港的法院或法官自称有“本庭”，“本席”，“我们”与“我等”等。其二，就一般用语而言，香港的判决书时见方言词语，还有不少文言词语。其三，就语法而言，香港的判决书有方言语法与不良的欧化语法。

浅析网络中式英语及其成因

王珊珊 卢志鸿

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外语系

由于互联网的发展与广泛应用，一种新的语言变体——网络中式英语冲击着人们的视线。网络中式英语是由中国网民创造并在网络上盛行的中式英语。可以说网络中式英语是网络和中式英语的产物。近几十年来，国内学者对中式英语已经有诸多研究，但对网络中式英语的研究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本论文旨在研究网络中式英语与传统中式英语的区别，以及网络中式英语的形成原因。

首先，作者简要概括中式英语、中国英语、网络中式英语的概念，以及这三者之间的关联与区别，进而从使用范围和自发性及目的性两个方面阐释网络中式英语与以往概念中的中式英语的不同。其次，作者从网民和社会两个方面分析了网络中式英语的形成原因。随着全球化发展，全民英语热的不断升温，中国自上而下的国民英语教育等，使英语学习成为了每位正在接受不同层次阶段教育的中国人不可缺少的重要学习内容之一，每位学习者必然会将他们学习英语和使用英语融入到社会生活和日常交往中，使英语语言的学习和使用陪伴着这些人度过学生时代，走进职业生涯，也将会陪伴着他们度过终身学习的旅程。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活跃在各大论坛上的大多是中年以下的网民，比如博客和社区多是 80 后和 90 后的网民，他们大都是从小学阶段就开始学英语，可以说英语学习伴随着他们的学业成长过程，因此在这些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出现中英文混用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而网络成为了这一代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媒介与平台，出现一些网络流行语和造词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从“偷菜” vegetal 一词便可见一斑。（vegetal 是英文词 vegetable 和 steal 的合成）。另外，从社会成因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全球化发展、中国与世界的接轨与融入、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在英语语言使用与社会文化的发展以及网络渗透的综合作用下产生一些新的网络中式英语词语便成了语言发展的必然现象。如“蚁族（antizen）”一词的英文，就是网民把英文的 ant（蚂蚁）和 citizen（公民）进行合成而创造出的网络中式英语新词。一些中国网民新造的英文词汇一旦在网络上出现，便很快被接纳并在网络上流行。语言是人们社会生活的交流工具，是人们思想活动的载体，因此语言的使用能够成为促进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面对这一英语语言与中国社会文化和网络渗透所产生的新生事物——网络中式英语新造词语的产生与应用，大家应持有何种态度，是包容、批判、疏导、还是否定，作者在文章的最后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并希望通过本文的探讨与分析能够引起语言研究者和使用者对这一语言现象的关注。

汉语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

王世凯

渤海大学文学院

一、语言经济与汉语经济

(一) 语言经济

语言经济学(Economics of Language)作为经济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的 60 年代中期，最早是由 Jacob Marschak (1965) 年提出，经 Vaillancourt(1980) 和 Grin(1996) 和的发展逐渐完善。关于“语言经济”，国内还没有公认的界定，总体看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语言经济学的角度，一是语言经济行为的角度。张卫国 (2008)、刘莹 (2011) 王清智等 (2003)、李现乐 (2010) 等。

(二) 汉语经济

汉语经济就是与汉语资源相关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收益。

二、汉语经济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一) 汉语教育的逆差

语文教育的长期性、高投入与教育效果的效益差、效率低形成鲜明对比，汉语教育投入和产出之间存在巨大的逆差。

(二) 汉语经济在外语热的潮流中显得暗淡

汉语经济的暗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汉语教育效率低下，投入和产出存在逆差；第二，专业培训机构少，经济效益低，汉语经济整体低迷。

(三) 对汉语经济的认识不足

语言经济毕竟是新兴的经济形态，新的课题，人们对它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尤其是对汉语经济的认识就更加滞后。

三、如何加速发展汉语经济

(一) 拉动语言内需

(二) 刺激汉语消费

(三) 推动语言就业

(四) 加强语言经济规划

(五) 加强语言资源调查

四、结论

同质有序说与异质有序说

王卫兵

安徽大学文学院

任何语符系统都是原型范畴(prototype category)。如果将普适性和恒常性作为其同质成分与异质成分的划界点，那么，它的内层和核心地带则主要属于同质成分的分布区域，外层和边缘地带则主要属于异质成分的活动范围。在系统中同质成分与异质成分只存在此多彼少的关系，而不存在此有彼无或此无彼有的关系。同质成分是语符系统保持自身稳定性的条件，是其能够成为交际工具的基础，是不同语符系统显示自身特征并得以与其他语符系统相区别的根据；异质成分是语符系统保持自身活力的条件，是其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强化自身功能的

基础,是不同语符系统具有开放性并通过相互渗透发展自身的根据。同质有序说 (theory of ordered homogeneity) 形成且只可能形成于结构主义时代, 异质有序说 (theory of ordered heterogeneity) 形成且只可能形成于后结构主义时代。尽管二者都只具有片面的深刻性 (unilaterally profundity), 但都是应予肯定的理论。因为没有前者就没有现代语言学; 没有后者就没有当代语言学, 它们都对语言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的语言适应研究

——以南京调查为例

王玲

南京大学文学院

本文以南京红山外来工子弟学校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全面考察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中的语言适应状况及其呈现出的特征。结果显示进城后农民工子女的语言适应体现在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两个方面。语言使用方面,进城后多数人由单语者转变为多语者,普通话的整体水平大幅度的提升,不同语码的使用出现分化;语言态度方面,对不同语码的评价呈现一致性趋势;由于性别、在宁居住时间不同,农民工子女的态度也不同。研究还发现,长期良性的社会互动以及频繁的交际需要才是影响个人选择某种语码的深层动因。

美国五州语言路线图及对中国区域外语规划的启示

王英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交流日益频繁,在经济发达的区域与城市外语及高水平外语人才的需求也随之增多,而区域外语规划研究尚在起步阶段。美国俄亥俄州、俄勒冈州、德克萨斯州、犹他州、罗德岛州于 2007 年—2011 年,举办的语言峰会及随后制定的语言路线图,为中国进行科学的区域外语规划提供了借鉴。

美国语言路线图定义

美国语言路线图 (Language Roadmap) 是数州出于当地语言需求,特别是外语需求,为培养 21 世纪成功的劳动力,在美国语言旗舰项目 (The Language Flagship) 的资助下制定的语言及文化教育远景目标及相关执行措施。

美国语言路线图出台背景

在全球经济竞争和人口多样化的背景下,美国数州已经意识到 21 世纪成功的劳动力必须具备较强的外语和文化知识,因此必须促进和支持外语及文化学习。

各州语言峰会将商界、政界、教育届召集在一起厘清外语需求;政府和商界代表的需求方 (问题方),而教育工作者、州教育委员会和高校代表供给方 (解决方)。峰会的任务是为了满足语言教育需求提出语言战略,最终制定出州层次上的语言路线图。

2007 年 6 月语言峰会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俄勒冈大学、德克萨斯大学举行,10 月出台了三个州的语言路线图。2008 年 9 月犹他州举行语言峰会,2009 年 5 月发布了本州的语言路线图。罗德岛州于 2011 年 12 月召开语言峰会,2012 年 6 月出台了语言路线图。

美国语言路线图共同点

1 使语言教育成为公共政策。商界与政府针对如何打造具备外语技能的劳动力提出建议，使语言教育成为公共政策。

2 在州层次上建立语言教育倡导和协调机构，使其肩负推动实施语言路线图的责任。如俄勒冈州设立语言习得办公室，俄亥俄州设立语言和文化服务中心，罗德岛州设立语言中心等。

3 积极培养语言教师，并给有外语能力的人士颁发教师执业证书。通过发放奖学金的方式鼓励语言水平高的学生从事教师工作；鼓励双语者在其他领域取得资格证书，以帮助双语和沉浸语言项目配备人员；招聘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移民，使其成为执业教师。

4 提升公众语言学习意识。消除固有的、普遍存在的偏见，即英语是商业中需求的唯一语言。

5 实施较早的语言教育，普遍要求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外语教育。

对中国区域外语规划的启示

美国语言路线图着力解决当前及未来的语言需求，是主要由地方商界自下而上发起的语言管理，可以为中国区域语言规划和外语教育规划提供借鉴。首先，区域外语教育规划应该基于本地的外语需求；其次，政府、用人单位、教育界三方须一起召开语言会议，共同商讨解决语言供需矛盾，提出外语教育规划；再次，区域外语规划必须要设立专门的统筹机构。

香港报刊广告文本变迁的再考察

吴东英、林敏奋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

本研究基于吴东英、钟美琼（2004）的研究框架，结合当代传播学和当代语言学的科学和分析方法，追踪分析香港中文报刊《星岛日报》广告于本世纪在文本方面的特点、变化和发展。研究发现：回归十周年至十五周年间，香港中文广告进一步体现多语、多文化社会的特征，具体表现在广告主题较上世纪的广告主题更着重强调具象征意义的价值，强调具现代化和西化的价值取向如“独特”、“享乐”、“自我实现”等价值；广告语言方面呈现更多的感染性语言的特征，纯英文语言的使用，口语、通俗的表达与文雅词藻、句式的糅合现象尤为明显。文章最后详细分析了香港广告文本的变迁与经济、文化全球化发展变化的联系，讨论未来中国修辞学学科的建设问题。

Trade Dispute as Discursive Manipulation: Investigating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U.S. Safeguard Measures against Tire Imports in China's Open Letter to Obama

吴鹏 Huang Cheng-cheng

江苏大学

Acknowledging the dialec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course and trade dispute (Wu-peng, 2010, 2011), and drawing on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to discourse proposed by Wodak (2001),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U.S. safeguard measures against tire imports in China's open letter to American President Obama.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five different discursive strategies, namely referential/nomination strategy, predication strategy, argumentation

strategy, perspectivization framing strategy, and intensification/mitigation strategy, and corresponding linguistic realizations are manipulated in this open letter, which all together construct 'identities of involved parties', 'nature of the safeguard measures', 'legal Requirem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safeguard measures'. The general implication of this research is that the trade dispute does not merely concerns economic, legal, political, or whatever seemingly 'self-evident' issues, but also has much to do with discursive manipulation, and that 'free' and 'fair' trade strongly advocated by international societies is actually a discursive construct and subject to power relationships.

交际空间与话语选择

——流动人口在务工流入地语言实态调查

武小军 王庆

西华大学人文学院

目前,我国流动人口已呈现出新的变化特征,集中表现在流动人口总量的持续增加,流动区域的散射多样,流动人口素质结构的悄然改变等。人口流动格局的变化直接作用于社会,并给社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文化、环境、教育、社会服务等的系列影响。在这之中,普通话与方言会经历比任何时候都复杂的激烈碰撞,由于人口流动区域的散射分布以及流动人口基本素质结构的逐步改变,方言和普通话在社会交会状态中会呈现何种变化趋向,其演变的规律怎样?为此,我们在2012年3-5月专项作了《外出务工人员语言使用情况》调查,并经SPSS统计得出基本数据,本文主要在此基础上量化分析流动人口在务工流入地因交际空间的变化而作出的话语选择等语言实态问题。

调查在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入地选点展开,本文所指称的流入地,不仅含东部地区,也含中、西部地区,包括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工业区以及中西部的一些重要流入区域。涉及的省市城市主要有北京,上海,浙江宁波、慈溪,广东广州、珠海、深圳、中山,四川成都,重庆,陕西西安等,同时兼顾其它散点城市。共发放调查问卷2000份,收回问卷1356份,剔除废卷后,共获取有效问卷1029份。

本文通过调查统计和量化分析后认为,当前的流动人口表现出的语言特征已发生明显变化。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工作、生活时的语言选择与使用的基本特征有:普通话在各个不同的交际空间里,已成为对外交际的重要选择,普通话运用甚至影响到了面对老乡时的语言选择,普通话对操持方言的言语集团正构成强力地冲击;操持方言的言语成员仍较稳固的存在着,但方言一般局限于特定的交际空间与人群,在非面见的交际空间中,方言使用比例较高,而在面对面的交际空间里,方言使用比例则下降。除普通话外,流动人口主动操持当地方言的人数比例不断增长,显示出较强的主动融入当地社会的意识;普通话或方言并非孤立、单一地存在于语言运用之中,普通话、方言的灵活转换,表明因流动人口素质结构的提高而呈现出语言多样性选择等典型特征。对普通话的选择运用,虽有“量”上的差异,但从整个面上来说,无论是东部流入地还是中、西部流入地,都不会影响流动人口对普通话的选择和使用,普通话现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真正意义上的通用交际用语,在工作、生活等关乎民生的诸多事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不能不说,国家在普及和推广普通话工作中显现出了巨大的成效。

维吾尔族汉语习得中的语法偏误研究综述

夏迪娅•伊布拉音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是通过对文献资料的阅读、分析、研究以及获取信息并得出一定的结论的方法。常用于介绍或评述某一学术问题,应将其看作所有严谨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本文在阐明偏误分析研究的基本问题和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探讨了目前维吾尔民族汉语语法偏误研究的现状、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以期能够促进相关研究的发展。

北京、南京、沈阳三个城市农民工语言状况对比研究

夏历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目前,我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总数达到2亿多人,其中,异地流动的农民工为1.49亿人,他们已经成为我国工业化进程中一支不可或缺的新型劳动大军。因而,农民工的相关问题,事关我国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和全面建设的大局。

农民工的语言问题是和农民工就业、实现身份转变等涉及其切身利益的问题相关的问题,值得关注。本文通过对北京、南京、沈阳三个城市农民工语言状况的对比研究,揭示出农民工语言状况呈现的总体特点;也试图通过对比揭示出不同城市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经济、文化地位和发展水平等特点,吸纳来的农民工语言状况呈现的各自特点。

北京、南京、沈阳三地农民工语言状况整体呈现出一些特点。在语言使用上北京、南京两地的情况基本一致,农民工在城市时使用两种语言变体——普通话和家乡话,两种语言变体在使用场合上出现分化,家乡话主要用于关系亲近的人之间,多用于非正式、比较随意的场合;普通话主要用于关系较陌生的人之间,多用于正式、庄重的场合。在语言态度上,农民工对普通话的态度较好,对自己家乡话的情感归属感比较强,但是对家乡话的地位和功能评价持一定程度的否定态度。沈阳吸纳来的农民工的语言状况有些不同,虽也同时使用普通话和家乡话两种语言变体,但是两种语言变体没有出现分化的态势;在语言态度上,对两种语言变体的情感和地位等评价都很高。

不同城市吸纳来的农民工呈现不同特点,在语言状况上呈现出不同风貌。如北京是我国的首都,是普通话氛围最为浓郁的地区。在北京务工的人员受这种氛围的影响,语言意识比其他城市务工的农民工明确而且强烈,能够清晰分清普通话和家乡话的界限,对普通话和家乡话的情感认同和理性评价区分明确,对自身普通话水平期望程度高,对普通话对自身发展的影响感触更多、更强烈等。而沈阳地处东北,是东北最大的城市,是东北三省农民外出务工的首选地之一。因东北官话和北京官话的历史渊源,文化程度不高的东北三省的农民工群体认为自己的家乡话就是普通,是导致沈阳市农民工语言状况有别于其他城市的主要原因。

从我国群体语言研究以及城市语言研究的角度看,不同城市、不同来源地农民工语言状况的对比研究,对推动农民工语言问题研究的深入,对推动我国的语言规划和社会语言学相关研究等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谈公交站名的汉英翻译原则和技巧

—以景德镇市公交线路翻译为例

肖琳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公示语是社会用语的一个组成部分，又被称作标识语、标志语、标语等。公交站台名是公示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发挥着指示的交际功能，这类公示语的翻译除必须遵循公示语的一般翻译原则和策略，又具有其自身的翻译特点。笔者从自己的实际翻译经历出发，以景德镇市公交线路翻译为例，运用丰富的翻译例证，考查了公交站名的翻译技巧和策略。译者需要考查源语的特征和含义，使译文符合译语的表达和文化习惯，让译语读者读得明白，从而实现这类公示语的交际目—指示功能。

父母称谓变异的实证研究

谢俊英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称谓是人与人关系的体现，称谓词是人际关系的语言载体。我国方言众多，称谓词丰富。对称谓词的研究在汉语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用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以北方方言河间话为样本，考察父亲母亲称谓的变异情况。论文探讨三个问题：

- 一、父亲母亲称谓的共时分布情况。
- 二、父亲母亲称谓的变异情况。
- 三、关于父亲母亲称谓的变异方向讨论。

A Quantitative Study of Chinese Tertiary Students' Self-concept of English and Bilingual Instruction Modes

许宏晨

外交学院英语系

This paper presents an investigation of 667 college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self-concept with different bilingual instruction modes via 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and compares the English learning self-concept between students receiving bilingual and monolingual instructio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frequency analysis, there were basically three bilingual instruction modes conducted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EMMI (English as the main medium of instruction), ECBI (English-Chinese balanced instruction) and CMMI (Chinese as the main medium of instruction); the results of ANOVA shows that EMMI group ha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global English self-concept and English ability self-concept than ECBI and CMMI groups; and the 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 reveals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students under bilingual instruction and monolingual instruction as for their English learning self-concept.

Students of bilingual instruction got statistically higher global English self-concept and vocabulary self-concept but lower listening self-concept than those receiving monolingual instruction.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ree pedagogical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before promoting bilingual education in a large scale, careful studies should be carried out to forecast students' possible psychological change, which might include motivation, anxiety, self-concept, etc; effects should be invested in cultivating qualified bilingual instructors; and since not all students are suitable for bilingual instructions, bilingual courses should better be provided as a voluntary instead of a compulsory one. This paper shed light on the non-lingual outcomes of bilingual instruction, and the accumulated efforts in this field will greatly promote a more mature bilingual policy in China.

嘎裂声的语音制约和社会制约

——一项基于 BNUPSCC 语料的研究

1. 许小颖 2. 叶卫平 3. 何怡 4. 赵欣如 5. 柯李瑞
1-4. 北京师范大学 5. 美国乔治安大学

近年来, 嘎裂声 (creaky voice) 在语言结构中的功能及社会意义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以往的研究表明嘎裂声这一发声态不仅可以是音素的区别特征和声调的感知线索, 还可以具有丰富的社会意义。本文对北京师范大学普通话水平测试语料库 (BNUPSCC) 中 80000 个单音节语音中的嘎裂声进行标注, 根据标注结果, 分析普通话单音节嘎裂声分布的两方面制约因素: 1.语音内部因素, 包括普通话声母、韵母、声调及发音人母语的相关语音音素, 如是否为入声等。2.社会因素, 包括发音人的性别、方言区、普通话水平等级等。本文是首次以大规模普通话测试语料考察普通话单音节中嘎裂声制约因素的研究。

Language Choice and Identity Representation: Based on Three Empirical Case Studies

杨荣华

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This paper examines speakers language choices in Nanjing city, Chenzhou immigrant town in Sichuan province and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UK. It aims to show the relation between language choice and identities and how language choices index speaker's acts of identities in different context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1) In different contexts, language choice and identity representation are not always synchronous. 2) Speaker's language identification affects their language choices, thereby to some extent affecting language vitality. This study may contribute to constructing harmonious sociolinguistic life, and for language planning and policy making in China as well.

活力与濒危：藏汉双语社区藏语文使用及态度研究

——以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菊花村一组为个案

姚春林

河北联合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在双语或多语社区，不同语言变体既存在互补关系又存在竞争关系。如果不同语言变体间互补关系强于竞争关系，则双语或多语社区相对稳定，社区中的各语言变体和谐发展；反之，如果社区中语言变体的竞争关系强于互补关系，那么，相对强势的语言变体将逐渐取代相对弱势的变体，社区具有从双语（双方言）或多语（多方言）向单语（单方言）过渡的内部动力，相对弱势的语言变体将逐渐处于濒危状态。

另外，语言的活力与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态度有很大关系。语言态度是指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尤其在双语或多语社区），语言使用者对其使用的语言形成的某种看法或评价。（王远新.论裕固族的语言态度[J].语言与翻译, 1999 (2): 9-14.）语言态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语言发展。一般来说，积极的态度有助于语言的发展；反之，消极的态度将导致语言逐渐失去活力。但是，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并不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由于社会其他因素的影响，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态度与行为倾向有时也存在矛盾。

我国是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民族聚居或杂居的地方通常是双语或多语社区。调查这些社区中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分析社区内不同语言变体的关系，对制定民族语文政策、保护民族语言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以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天堂镇菊花村一组为个案，采用问卷调查、辅以访谈的方式，调查菊花村一组藏汉双语社区的语言活力、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

结果显示，在菊花村一组这个藏汉双语社区，93.5%的被试掌握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变体，藏语和天祝话是社区最重要的语言。被试的语言文字态度包容性较强，认为藏语、汉语普通话、天祝话、藏文、汉文都很有用，希望这些语言文字都有很大发展或在一定范围内发展，希望后代接受藏汉英三语教育，成为多语人。

调查结果同时显示，藏语的社会功能在当地正逐渐弱化，现仅为家庭内部或本民族熟人之间的交际语。并且，即使在家庭内部或与本民族熟人聊天时，随着年龄的减小，被试讲藏语的比例也逐渐减少。“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位，是后代自然系的语言的第一‘学校’，也是一种语言在衰微过程中用于交际的最后场所。”（王远新.中国民族语言学：理论与实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218）如今，少部分藏族年轻人即使在家庭内部也不使用藏语做交际语。如果不对藏语使用现状进行干预，久而久之，藏语将在当地失去交际功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对广州服务类职业口语现状的思考

叶竹钧

广州大学

服务类职业口语是反映社会文明程度和民众精神面貌的一个形象窗口。通过调查，我们初步了解广州市职业口语使用的基础、需求和培训现状。针对当前存在的不足，我们提出了应该结合产业发展、社会需求、语用特点来解决应用滞后、农村城市化超前培训和从基础到专业技能均等发展的长效性机制问题。

翻译中文化视点刍议

易明华

广州航海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

简奈特 (Genette) ,即法国文学理论家, 所提出的超文本范畴: 已经从纯文学作品拓宽到非文学作品; 其次, 超文本的定义已从书内外装饰性手段及传统惯例扩大到文本产生的文化环境、经济条件、政治体制等等大环境因素. 从研究方法论的角度来观察, 简奈特所建立的研究超文本因素模式, 是要构建一个包括文化因素在内的超语言和超文本的概念框架, 即包括从文化视点、以及从语言外部看语言和文本的功能.

汉语与英语这两种语言在文化、历史、地理、社会背景、人情风俗、逻辑思维、语言结构、语意表达和音韵节奏等许多方面是不相同的, 特别有时在文化内涵, 即: 文化意蕴、文化联想、文化思维和理解等方面差异很大, 有时很微妙. 在英汉互译中, 不仅要求表达出原语的语言表面意思, 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反映或揭示原语的文化内涵. 按照简奈特 (Genette) , 所提出的超文本范畴和文化视点: 从语言外部看语言和文本的功能观点, 这对英汉互译工作者更深入翻译研究, 开辟了新的翻译途径和视野.

众所周知, 人们对语言的沟通理解, 总是无法摆脱他们所生活的语言环境和社会背景, 更无法脱离他们长期以来在内心深处打上深深烙印的文化意识和观念, 以自己内心深处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固有生活习俗、文化意识和文化观念来揣测和理悟异域语言文化, 也有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甚至会严重失误. 因此, 本文作者阐述了译者在研究语言差异的同时, 必须充分注意其文化差异; 设法使译语的读者和听者所产生的文化意识, 文化形象、文化感受和文化联想, 尽可能与原语读者和听者所产生的相接近或者是一样; 即充分运用包括原语 (source language) 和译入语(receptor language) 的文化因素在内的超语言和超文本的概念框架因素.

双语教育模式与语言保持——以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语为例

尹小荣

南京大学文学院

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锡伯自治县, 也是目前全国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留存的唯一语言活化石. 建国以后, 该县锡伯语双语教育模式经历了二元式、过渡式、发展保持式和静态保持式. 通过对该县教育模式与语言使用、语言能力及语言态度的相关性分析, 发现发展保持式是锡伯语保持的最有利模式.

A Case Study on the Closed-Class Patterns of Mongolian-Chinese

Bilingual Discourse--Means of Identity Maintenance

张冬冰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This paper aims to discover the closed-class (grammatical and phonological) patterns in Mongolian-Chinese bilingual discourse. The data is a piece of naturally occurring conversation between three Mongolian-Chinese bilingual students. Through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the researcher finds that when code mixing, the speakers preserved the Mongolian grammatical features like genitive, deixis, plural, spatial relation, perfectives and conditionals; the speakers also preserved the phonological feature of Mongolian, which is studi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ne variation and pronunciation variation. The researcher also demonstrates that the underlying reason for this phenomenon is relevant to the speakers' conscious of social identity. This paper also generalises from this case study that in code mixing the speakers usually preserve the closed-class features of the dominant language (A-language), which would also have impact on the expression of inserted language (B-language).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当代老年人称谓研究

张军

钟山职业技术学院爱恩国际学院

语言称代系统的研究通常包括两个子系统：语言称谓系统和语言代词系统。称谓是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相互称呼的用语，可分为亲属称谓语和非亲属称谓语（或社会称谓语）。本研究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讨论当代老年人称谓，考察其在当代社会语境中的应用，探讨影响老年人称谓使用的社会文化要素和心理动机，从一个侧面了解当代社会结构及社会关系的变化，体验语言与社会的共变关系。本研究采用了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本研究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来搜集当代老年人称谓的使用情况数据。调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调查亲属间对老年人的称谓使用情况，包括晚辈对老人长辈的称谓以及老年人亲属间的称谓。第二部分调查没有亲属关系的人对老年人的称谓，包括同事、医生、服务场所工作人员、陌生人等对老年人的称谓。调查还涉及老年人对一些常见的“涉老”用语的使用态度，如“老人卡”、“老弱病残孕座”、“老年痴呆”等。调查发现，一方面当代社会中老年人称谓总体上体现了布朗和吉尔曼所提出的两个基本语义关系或社会特征：权势语义特征和等同语义特征。另一方面，在称谓语的“身份标示”方面存在一定的“不匹配”现象，即在一些情境下老年人群体对于老年人称谓的期待和实际对他们的称谓存在一定的差异，有些是他们不能接受或希求改变的。

网络流行体的意向性解释

张蕾

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心智哲学中的意向性理论探讨人的思维如何与语言的使用和外部世界的事件相联系。本文尝试阐释个体意向性与集体意向性在网络流行体“蓝精灵体”产生与传播中的运作机制，指出个体意向性与集体意向性先于语言的使用，它们的存在促使社会个体选择指向对其自身有意义的外部事件，利用仿篇与原篇在语调、结构、内容上的相似和差异，激起人们的联想和类推，得到大众的认可，转换为信息得到传播，进而强化促其产生与传播的意向性，体现了全新的话语模式同时具有个体属性和社会属性。

中越边境贸易市场语言生活状况调查研究

张黎 杜氏秋姐 高一瑄

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

本文在对中越边境上的相邻的两个市场——中国凭祥浦寨市场和越南的清新市场的100名中国和越南商户的访谈调查基础上，研究该边贸市场上的语言生活状况以及相关问题。主要内容包括：

一、中越边贸市场经营户使用的语言

中越边境市场经营户的第一语言有以下八种语言或方言：汉语普通话；南宁白话；湘方言；（4）凭祥土话（壮语）（5）客家话；（6）广东话；（7）越南语；（8）岱依语（tiéng Tày）。但中国经营户在市场上使用的语言主要是普通话；而越南商人的第一语言与实际使用最多的都是越南语。

二、中越边贸市场经营户的习得情况及水平

中国商户100%都学过越南语，其中58%达到中等水平；而越南商户只有68%学过汉语，但其中73%达到中级水平。

三、中越边贸市场语言生活的特点

中越边境市场是一个特殊的语言社区，这社区是在中越两国边境区域形成的，除了汉语普通话和越南语的接触之外还有同一语系的汉语方言和越南语方言同时碰撞，相互融合产生一个多元语社团。

四、中越边贸市场语言生活存在的问题

1.中越边境市场的商业还不是很兴旺。

2.语言的使用还不全面。

3.语言传播还不是很广泛，交往不是很深入。

4.第四，两国管理机构对语言管理方面还不够重视。

五、汉语在中越边境贸易交往中的地位和价值评估

第一，汉语在越南边境市场的地位和使用价值较低。

第二，汉语在该市场上的地位有上升趋势。

第三，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学习汉语的人数也会越来越多。

迁移理论关照下的安徽中原官话与英语语音习得

张丽红

安徽大学

语言是交际的工具，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学习者的语音水平直接影响听力和口语水平。据统计，中国英语学习者在英语学习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却在英语口语输出上成效很小，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学习者的语音问题严重桎梏了其口语表达。根据迁移理论，学习者的母语方言将在英语语音习得过程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安徽省境内分布着五种汉语方言：中原官话、江淮官话、宣州片吴语、怀岳片赣语、徽语。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贺巍的“中原官话分区（稿）”（2005），安徽省境内的26个市县分属于中原官话区的商阜片、徐淮片和信蚌片。“迁移”这一概念由著名的教育心理学家D. P. Ausubel提出，他认为迁移是一种认知活动，体现了个体主动的心理加工过程。在外语学习研究领域中，迁移特指母语对个体外语习得所产生的影响，即语言迁移。语言迁移研究始于20世纪40、50年代的美国，语言学家R. Lado认为，在外语学习环境下学习者普遍依赖已掌握的母语，倾向于将母语的语言形式、意义和与母语相联系的文化迁移到母语对二语学习和使用产生的影响被称为语言迁移。语言学家T. Odlin认为语言迁移可以区分为正向迁移（positive transfer）和负向迁移（negative transfer）。正向迁移指母语与目的语的相同之处会促进第二语言学习。语言学家H. Ellis指出，在第二语言习得的早期母语的促进作用比较明显，因为这时学习者还未能构建一个发展规则。负向迁移即母语干扰，主要是由于母语和目的语的某些形式和规则系统不同而被学习者误以为相同所致母语干扰，导致错误出现。Ellis的相关实证研究表明，母语干扰是第二语言习得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安徽省境内分布着五种汉语方言：中原官话、江淮官话、宣州片吴语、怀岳片赣语、徽语。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贺巍的“中原官话分区（稿）”（2005），安徽省境内的26个市县分属于中原官话区的商阜片、徐淮片和信蚌片。本文主要依据迁移理论，以安徽中原官话区方言语音和英语语音语料为调查研究对象，运用语音学和音位学相关知识对安徽中原官话和英语的语音特征进行系统对比分析，在音段层面如元音、辅音、音系规则以及超音段层面如重音、不完全爆破、连读以及语调等方面系统研究安徽中原官话对英语语音习得的正负迁移。本文对二语习得中的正负迁移理论有一定的实证价值，研究成果将直接应用于大学英语教学环节，对提高皖籍中原方言区学生的英语听说水平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新疆区情与语言规划

张梅

新疆师范大学

为适应新疆语言社情的多样性、复杂性，新疆的语言政策及语言规划主要通过语言教育规划来实施。自建国以来，新疆的汉语教学规划及双语教学规划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大力推行国家通用语的同时，兼顾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与发展，取得很大成绩。新疆少数民族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以国家《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条例》（新条例）等为法律依据和指导思想，为保护、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权利，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根据新疆的具体区情，制定了一系列民族语言政策，其核心是实行语言平等，禁止语言歧视，保障少

少数民族语言权利，鼓励各民族互相学习语言文字。体现在语言规划上，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有不同的侧重。制定怎样的语言规划要以语言政策为前提，任何规划都不能超出政策允许的范围。而语言政策的制定又必须以语言法规为依据，有法可依才具备了正确的首要前提。但语言规划所涉及的因素绝不仅是与语言法规与语言政策相关的政治、法律因素，还涉及诸多相关的客观因素和人文因素，如少数民族的地域、经济、文化、心理、情感等因素。语言教育是语言规划得以实现的主要途径，新疆解放以来的语言规划主要是通过语言教育来实施的：

（一）汉语教学规划

- 1.汉语选修阶段
- 2.汉语必修阶段
- 3.汉语主学科地位的确立
- 4.汉语教学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5. 汉语教学的改革探索

（二）双语教学规划

- 1.双语教学实验
- 2.双语教学的大力推进

新疆语言规划及语言教育政策的推行，呈现出以下鲜明特点：

1.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新疆语言规划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不同时代语言规划的内容亦不同。

2.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和统一性。纵观新疆各时期的语言规划，无不以语言法规及语言政策为依据，且一旦实施规划，政策又能够为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这些支持和保障来自于地区层面、自治区层面及国家层面。

3.以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主线，兼顾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保护与发展。

取得成绩的同时，新疆的语言教育规划也存在着“目标制定过于激进；强调统一性，缺乏多样性；强调政策性，缺乏科学性”等值得反思的问题。

舆情视角下的汉语能力测试

张平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汉语能力测试”自面世以来就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与热议。各界观点大致分为三类：支持、反对和质疑。通过现象看本质，各方观点的关键问题只有两个，有没有必要开展“汉语能力测试”？及公众对“汉语能力测试”的忧虑。针对关键问题，提出三个实施“汉语能力测试”的对策与建议，呼吁社会各方共同协作，以达到测试提高国民汉语应用能力的目的。

中国家庭暴力受害女性通过网络发帖构建的身份认同 ——言语行为视角

张天怡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本文重点讨论了中国家庭暴力受害女性如何通过在网络论坛上发帖自述来建构自己的话语身份。文中分析所用的语料为受害者在天涯社区发布的主题帖。为了更细致、准确地分析语料，本文对 Searle 的言语行为理论框架进行细致分类，并引入了 Kress 和 van Leeuwen 的视觉语法理论来分析帖子中的插图，以 van Dijk 的宏观言语行为理论来探索言语行为宏观架构。文章以小句为基本单位，通过分析各主题帖所包含的言语行为，主要总结出三大类宏观言语行为，进而相应地归纳出三大类话语身份：宣泄者（叙述者、抑郁的倾诉者、愤怒的控诉者）、求助者（迷茫的求助者、法律求助者）和勉励者（自勉者、共勉者）。对语料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宣泄者占总数的 21%，其中 90% 的宣泄者重在表达自己消极、抑郁的情绪；70% 的受害者通过发帖寻求帮助，但寻求法律帮助的仅占求助者的 8.5%。一方面，网络所具备的匿名性和广泛性的特征使其成为一个看似虚拟、实则真实的空间，使受害女性得以自我赋权，通过网络这一渠道来表达对家暴的态度、寻求帮助、自我鼓励或者为他人提供建议与告诫。另一方面，分析结果也显示了中国妇女通过法律手段主动进行自我保护的意识有待提高。此外，主题帖也体现出了母亲、妻子、女儿、儿媳等家庭身份认同对受害者身份认同所起到的或正或负的协商作用。

汉藏语系语言的时空模式和概念结构

张燕
北京中华女子学院对外汉语系

汉藏语系民族在认知时空的过程中，保留着明显的“体认”思维特点，表现出“人体→空间→时间”的认知路径。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人的发现和语言空间的形成”阶段。这是人类思维发展的低级阶段。先民们先认识自己的身体，命名为“口”、“耳”、“鼻”、“舌”、“身”等人体名称，然后将这些人体名称指称具体物的相似部位，如山头、山口、山脚等。思维中将对身体的方位认知投射到对周围空间的认知上，语言中出现了借人体词语表达周围空间方位的词语，如藏语：/+[], 上身， 隐喻空间/+[], 𩫑[]ε/上方。第二阶段为“空间的配置与时间的模型建设”阶段。当人类认知进化到较高阶段，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渐模糊意识到“时间”概念，就将具体的方位域映射到抽象的时间域，语言中产生了时间隐喻系统，表现出“人体→空间→时间”的发展路径。其语言表现可分为：1. 人体“眼”、“脸”→空间“前”→时间“现在”；2. 人体“脸”、“背”→空间“前”、“后”→时间朝向；3. 人体“头、中/腰、尾/臀”→空间“长、短、段”→时间长度；4. 人体“坐、行、吃、睡”→空间“升、降、起、落”→时间运动。

由此得出汉藏语系时空隐喻模式和思维发展过程：人类先认识自身，再将人体域投射于具体物（空间），这是人类较低层次的认知能力；人体词不仅投射于具体物（空间），还投射于抽象的概念表达，如直接拿人体词来表达时间概念，反映了人类更高层次的认知能力。汉藏语系时间隐喻的源域包括：1. 人体本身，即人的身体部位“脸/面”、“头”、“腰”，

感官“眼”、“嘴”等；2.人体生活其中的自然环境“山”、“水”和天体“日月星辰”；3.人体的住所“房子”、“屋檐”等。汉藏语系时间隐喻的源域不仅包括狭义的空间方位词，还包括比空间方位词更具体、甚至空间方位词源域的事物——人体，以及与人体密切相关的实物，用这个内容和层次丰富的源域来映射时间域，语言中就用相关语词来描述时间概念。汉藏语系语言至今仍较好地保存着这种自然、原始和形象生动的“人体→空间→时间”的隐喻图式和认知特点。

古今中外认识世界的理由和方式具有一致性，这是由人的特征决定的。但不同的语言又有一定的差别，由此形成民族语的风格与传统。本文探讨汉藏语系民族时间概念认识过程中的“体认”特点，揭示人类思维从低级到高级的认知规律，透视汉藏语系民族“人体→空间→时间”的认知路径和朴素的时间观，对于民族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

新闻发言人个性化语言的传播价值

张洋

渤海大学文学院

语言是新闻发言人跟媒体和公众沟通的重要载体，新闻发言人通过语言等来传递信息、表明立场、澄清事实、纠正错误等。在发布会上，无论是发布新闻还是回答记者提问，发言人主要通过有声语言和体态语来完成交际，他们的个性存在于这种交际之中并落实到语言上，也体现在与媒体及公众的不断磨合之中。

新闻发言人可以说是一种语言职业，个性体现在语言上，包括“说什么”和“怎么说”两个方面。“怎么说”最能体现发言人自身的素质与个性，包括他的思维能力和品质、文化积累和生存态度、世界观和方法论等方面。发言人怎样把自己的个性、风格特点跟国家的政策很好地结合，并通过好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是当好新闻发言人应该努力探寻的内部原因之一。

人们在交际中要想达到良好的交际效果，应该注意交际要有个度，这个度是文质彬彬，就是内容和形式的结合。衡量这个度要看交际的迅速、到位，主要看效果，绝对不只是一方的自说自话。在发布会现场有记者提出要听发言人用自己个性化的语言总结或评价，这反映了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可能是发言人发言中书面语色彩比较浓重，或是完全念稿，语言僵化，不生动。这种发言人往往不敢说，以保守为上策，个性自然无从谈起。一方面是记者和公众的需求，他们想听到除去官话、套话以外的发言人的个性化语言，生动的，鲜活的，富有个性的。

一个人真诚就能展示个性。如果个性展示得不够，那么真诚度也就多少有些问题。个性还有示范和引导的作用。个性是积极的、向前的，发言人要展示个性不是目的，受众有呼唤个性的要求也不是目的。目的是希望交际双方真诚地交流。善解人意，和谐沟通，达到高层次的交际，从而进一步合作、攀升。

滕州方言中 pf 类声母的语音变异研究

张瀛月

中国社科院语言文字应用系

在滕州方言音系中，有一类特殊的唇齿音声母，即 [pf]、[pf']、[f]，在这里我们称之为

pf类声母。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pf类声母的发音、历史来源、发展演变及形成原因等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按照张成材(2000)对汉语方言中pf类声母分布范围的归纳,该类声母主要分布在陕西、山西、甘肃、山东、湖南五省,其中山东省内代表县市是枣庄、滕州、泗水、新泰四地。本文是以滕州方言为代表对pf类声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变异结合起来进行全面的考察。从历时的角度来看,pf类声母的来源于古知系合口字。从共时的角度看,由于受汉语普通话的影响,该类声母在滕州人们的日常交际中主要存在三类变异形式,即pf类(pf, pf', f)、ts类(ts, ts', s)、tʂ类(tʂ, tʂ', ʂ)。为了全面考查滕州发音中pf类声母的语音特点及变异形式的社会分布情况,首先从滕州方言中挑选出一些常用字,用语音分析软件Praat11.5测量该类声母的VOT与Gap值,对其进行声学上的描写。接着,我们对100位调查对象按照年龄、性别、职业与文化程度进行分类,使用Spss11.5对各类群体pf类声母变异字的使用频次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pf类声母的使用与语言使用者的社会因素、交际对象与交际场合密切相关。具体来说,青少年主要使用ts类或tʂ类变体,中老年人的主要使用pf类变体;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主要使用ts类或tʂ类变体,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主要使用pf类变体;交际对象间的关系越密切,越多地使用pf类变体,关系越疏远,越多使用ts类。交际场合越正式,越多使用ts类或tʂ类变体,越随意,越多使用pf类变体。

汉韩亲属称谓语对比研究

——以《红楼梦》及其韩文译本为中心

赵冬梅

韩国高丽大学中文系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由此,翻译便成为一种跨文化的活动。被视为文化负载词的称谓语,由于其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常常使翻译者面对困境。《红楼梦》称谓语的翻译一直为各界学者所关心,已有论文讨论了《红楼梦》称谓语的英文、日文翻译情况,但对《红楼梦》韩文译本加以调查对汉韩称谓加以对比的论文,至今尚未出现。

《红楼梦》的称谓语基本反映了小说所处时代社会中上层亲属之间称谓的面貌。虽因时代发展,一些称谓语现在已经不再使用,但透过小说称谓语显现出的中国人的亲属观念,在称谓时遵循的一些原则等,仍存在于今日。因此,对其亲属称谓语进行研究无论从历时角度还是从共时角度来看都有意义。

本文将通过对2009年韩国出版社韩文译本《红楼梦》的考察,对汉韩亲属称谓语进行对比,在两者的同异之中发现相同或不同的社会文化因素在语言中的呈现,以探明汉韩称谓语的特点和规律。

一

汉语的亲属称谓语繁多而复杂,与中国同属儒教文化圈的韩国,同样有着复杂繁多的亲属称谓语。很多在欧美语言中找不到对应词的汉语称谓,在韩语中都可找到对应词,这就使得很多在《红楼梦》英文译本中无法处理的部分在韩文译本中得到了明确的对应。

从《红楼梦》亲属称谓语的韩文翻译中,我们看到,韩语亲属称谓语同样体现为重视礼法秩序、等级秩序、血缘关系,以及卑己尊人的特点。长幼有序,内外有别,亲疏分明等原则在《红楼梦》亲属称谓语的韩文转译中,得到了明确的表现。

二

虽然绝大部分汉语亲属称谓在韩语中都能找到对应译词,但韩中两国毕竟处于不尽相同的文化氛围中,这就使得韩语亲属称谓表现出与汉语不同的独特之处。

首先,韩语亲属称谓较之汉语更为复杂琐细。如:对男女有别的重视强于中国,男性、女性家庭成员称呼哥、姐及他们的配偶,使用的称谓语皆不相同。而女性在嫁入夫家后,对丈夫弟妹使用从仆称谓,不像汉语那样从夫称谓。这些称谓语的使用对于人物的家庭及社会角色的构建有着非常的作用。在《红楼梦》汉韩称谓语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这一点。

另外,《红楼梦》的亲属称谓语有很多独特之处,如子女称长辈时使用从仆称谓,年少主人对有地位的仆人使用拟亲属称谓等等,韩文译本对这些称谓的处理也体现出不同的文化因素对语言的影响。

同时,由于韩语敬谦语体的存在,以及附着于称谓语的敬语后缀的使用,都使韩语亲属称谓呈现出自己的面貌。

三

通过汉韩本《红楼梦》亲属称谓语的对比,我们可以对两者的同异有具体的了解。中国和韩国同属儒教文化圈,汉韩语言中的亲属称谓体现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宗法文化特色。内外有别,父系母系成员从称谓上可以清晰分辨;尊卑有别,在称谓时地位差异有明确的表现;重视礼法秩序,重视亲族关系,在称谓中既强调礼貌原则,又重视情感因素,等等。以上种种,双方呈现出大致相同的倾向。但由于中国和韩国毕竟处于不同的文化氛围中,使亲属称谓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而考察两种语言中哪些亲属称谓还在使用,哪些亲属称谓已经消失,也可以使我们看出两个国家在社会发展中,家族成员身份的变化,亲属观念的变化等等。

价格垄断话语的互语性分析

赵芃

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文本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视角讨论了话语的互语性问题。批评话语分析认为不同的行为主体之间存在冲突,会运用不同的话语策略以期达到自身的意图,并形成话语斗争。这种情况多见于争论式话语中,并导致某一话语在该社会事件中占有主导地位。所以对此类事件的关注不仅不能停留在对某一个文本的分析上,也不能只对与事件相关的多个文本进行互文性分析,而是更要关注对事件链,包括文本链、语体链,以及话语策略的分析,这就是互语性分析。本文以发生在 2011 年年末的中国电信涉嫌价格垄断为分析对象,运用话语-历史分析模型进行互语性分析,从语体链、话题链、话语策略等角度分析该事件中的互语性现象,揭示其话语斗争的实质。

从推普宣传口号看我国语言规划的特点与问题

赵燕

昆明学院

普通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所标志的语言统一历来被看作国家独立和民族团结的象征。为进一步配合普通话的推广,1997 年 1 月 6 日,国务院第 134 次总理办公会议决定,自 1998 年起,每年 9 月份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从 1998 年起至 2011 年一共举行了十四

届。每一届推普周都根据活动主题印发宣传口号。这些口号一经发布，就将语言规划内容、标准和理念传播开来，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采用 Kaplan 和 Baldauf (2003) 提出的分析框架，推普宣传口号涵盖了中国语言规划的四种类型，从多个角度对普通话进行推广和传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一、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的法定地位通过宣传家喻户晓。普通话的交际价值和工具价值得以凸显，普通话成为许多语域的交际用语，充分发挥了语言的交际价值。

二、本体规范强调语言的规范化，保障语言的标准话和规范化。一系列的规范文件和工作，推进了普通话的规范工作。

三、从雅化的角度来进行声誉规划，成功地让普通话代表了一种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

四、强调热爱祖国语言文字，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注重从认同的角度来培养公民对国家忠诚的感情。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刘海涛 (2006) 从定义变迁的角度归纳语言规划领域转变的七组特征，赵守辉 (2008) 指出语言规划理论研究正在经历着从古典时期到现代时期的转化。伴随着这些理论认识的变化，推普宣传口号的分析可以为我国语言规划提供一些启示：从实用主义到语言人权、从语言认同到身份建构，从学校教育到公民教育、从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到双向渠道。

浅谈负面事件的命名

赵一农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

公众在一段时间内会关注某个事件，但他们的兴趣转移很快。媒体要迎合公众兴趣转移快的特点，需适时有选择性地凸显关注焦点。媒体在选报新闻时，会搭建一个导向性的框架，事件的命名是框架搭建的重要一部分，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一个好的事件命名可以延长对事件的关注周期。

亚运会志愿者对不同英语变体的语言态度和交际态度调查

赵玉超 陈建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本研究采用质与量相结合的方法，对比考察了亚运会志愿者与非志愿者对世界英语的态度，以及基于语言态度的跨文化交际意愿。调查对象为 179 名在校大学生，其中 119 名为亚运会语言类专业志愿者。调查的五种英语口音分别为英国英语，美国英语，美国黑人英语，印度英语和中国英语。对两类群体的主观投射测试结果比较显示，大学生专业志愿者对标准变体的评价显著高于非标准变体，对印度英语的评价显著低于其它变体。志愿者与非志愿者对五种变体的态度没有显著差异，相比其它非标准变体，更偏爱标准英语变体。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通过问卷法，进一步比较调查了两类群体对持不同英语口音人的交际意愿。调查结果与主观投射结果相似，志愿者和非志愿者们更偏爱与说标准英语口音的人交流，对于非标准英语口音说话人，特别是印度人的交际意愿较低。

后期访谈验证了上述两类结果。研究表明,志愿活动对于大学生志愿者的语言态度并没有太大影响,志愿过程中的跨文化交际事件对他们的总体交际意愿影响并不显著。长期受国内英语教育、西方媒体等影响,英美英语已然成为国内学生心目中的权威变体,这种感官态度偏向甚至对交际过程产生影响,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权威口音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说话人的交际地位,这一结果也从语言本身角度说明了语言对交际的重要影响作用,对解释不同的跨文化交际现象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言接口

—以台湾华语「有+NP+在」与台湾闽南语「有+NP+伫咧」为例

郑宝珊

国立新竹教育大学中国语文学系研究所

公元 1949 年之后,由于政治因素强力介入,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北方官话系统与台湾当时族群的强势语言---闽南方言产生了无可避免的语言接触;虽说汉语方言皆为古代汉语演变而来,但因地域的不同,两种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也有差异(李如龙 2005),这些差异在接触之后开始融合,加上两岸长达近半世纪的文化交流中断,政治影响及当地族群方言与文化等因素,华语在台湾的演变于词汇与句法已经发生了多方面的、比较明显的语义与语用变异。

虽说前人对于华语存在句与有字句已有诸多论述与研究(Charles N. Li & Thompson 2007; 呂叔湘 1992[1942]; 劉月華 et al. 1996),但多由句法结构的角度出发,而本文将藉由文献、语料库、网络论坛及电视节目搜集而来的语料,以语言接触与语言变异的角度,并辅以句构分析讨论台湾华语「有+NP+在」与台湾闽南语「有+NP+伫咧」之间的比较,以期解释台湾华语的语言变异现象。

近年在台湾社会中,普遍存在一个现象:在特定语境的口述中,将「在」放在句尾,用来强调前方的名词词组。这种句法结构在台湾华语语法中并不常见,但闽南语语法中存在,若将台湾华语与台湾闽南语语料各取两笔,以〈表一〉说明结构:

	Topic	Subject	VP				
			Shi	Adv.	V	NP	complement
台湾华语	妳嫁进来后,	自己		就要	有	自己的规范	在
	美白针	(美白针)	是	真的	有	它的功效	在
台湾闽南语	照阮咧想	(照阮咧想)		差不多	有	两斗的情理	伫咧;
	伊	所写的批内			有	满满的圣火	伫咧

由此表可以看出,台湾华语与台湾闽南语于此结构的雷同度极高,并符合(曹逢甫 & 謝天蔚 1995)所提出的汉语主题结构。若主题与主语不相同,除去主题之后,只有主语与谓语,则语意不完整。而两者其他共通的现象还有:

- 「是」(Shi)与「就要」、「真的」等程度副词,均可于「有」的前方同时或分别修饰「有」。
- 「有」之后紧接名词词组,在/伫咧放在句末,强调名词词组对于主题的正面重要性。「在」于华语为响度高的去声调,可以强调说话语气与心理情绪反应,并引起听者的注意力与共鸣(顏秀珊 2002),进而形成口气性焦点(范開泰 & 張亞軍 2000: p196)。

值得注意的是,当语意转为负面时,只有闽南语可以将「有」代换成「没有」,如:

- (1) 同事 亲像 拢 无 感情 伫咧, (闽)(林榮森 1999)

(2) 同事好像都沒有感情在, (华)*

因此语言接触而产生的变异, 确实出现于台湾华语, 且使用此结构时有几个特点:

1. 为补语结构; 无法单独成句, 必须与主语联用, 才会使句意完整。此为引介句的主要特征; 说话者预期听者不知道此名词词组的存在(Charles N. Li & Thompson 2007: p.371)。
2. 在华语使用时, 必须使用强调正面价值的语气。
3. 这种现象在台湾华语的非正式口语表述中已经成为常态。

可以将<表一>简化成以下公式:

Topic + Subject + 程度副词/是字句 + 有 NP 在

蒙古民族身份的多模式话语构建

郑海翠

内蒙古大学

《蒙古秘史》是蒙古民族现存最早的历史文学典籍, 记述蒙古民族形成、发展、壮大的历程。《蒙古秘史》在展现了蒙古民族的历史之特殊, 生活之神奇的同时构建了蒙古民族身份。本文集中分析蒙古族身份是如何通过多模式话语构建的, 其中语言及其编排形式, 图片及其他符号形式仅仅是为了吸引读者的注意、增加生动性还是有其他的作用? 这些意义表达手段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中英对外语言传播教师培养模式对比研究

郑梦娟 白杨

中国人民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已取得诸多成绩, 但其发展道路上的三大瓶颈之一——汉语国际教育师资的培养工作, 不论是政策层面还是实践层面, 仍需学界进一步深入探讨。与之相比, 同样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英国英语国际教育, 其师资培养已在产业化、科学化、制度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十分值得借鉴。本文以文献法、数据统计法、对比分析法等为主要研究方法, 从教师的队伍概况、培训模式、资格认证等方面, 将英语和汉语的国际教育师资培养模式加以对比分析, 指出我国的相关工作应着力于以下方面: 扩大教师来源, 提高师资素质; 建立融资模式, 加强资金管理; 完善培养方式, 规范培训体系; 改革认定机制, 建立评价体系。此项研究, 旨在为汉语国际传播提供政策参考。

政治隐喻与社会现实变奏

—— 以《人民日报》1949-2012年元旦社论中的战争隐喻为例

钟小佩

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政治隐喻与社会现实存在一种辩证关系, 一方面, 政治隐喻被社会现实所构成, 并受到

社会现实的限制；另一方面，政治隐喻又促成社会建构，从而改变社会。《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经历了 64 个年头的不同历史阶段，虽然其“政治是战争”的概念隐喻一直没有变，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战争元素的所指、突显和隐藏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人民日报》1949-2012 年元旦社论中的战争隐喻分析揭示了政治隐喻与社会的相互建构和制约的关系。

《现汉》字母词风波引发的思考

周洪波

商务印书馆

近日，首都百余位学者联名举报《现代汉语词典》第 6 版正文收录 239 条“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违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法规，引起各大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举报方先是举报《现汉》收录字母词内容违法；接着将焦点转为现代汉语词典收录的应是汉语词条，字母词不是汉字和汉语，收入汉语词典正文本身就是文不对题；再后来又转移为是先把外文翻译成汉字，再吸收到汉语中来，还是以外文字母的形态直接插入汉语中使用，分歧如此简单。

透过这场学术论争，可以看到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国粹主义仍然阴魂不散，而国粹主义背后，是语言意识形态进步与复古、科学与守旧的又一次交锋和较量。从这种意义上说，《现汉》字母词风波是语言规划的又一案例，它再次证明了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现代世界接触碰撞而产生的传统与变革问题，仍然是中国近现代百年历史的核心问题。

“巴西人=罗拉尔多”？

——体育新闻报道里的一种指同表达

祝晓宏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当代体育新闻报道里，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指同表达，即，使用属概念来指代种概念。如用“巴西人”来指代巴西球星罗拉尔多或巴西足球教练斯科拉里等足坛名人。这种“以大指小”特殊的指同现象，可以形式化为“国家名+人”，功能上用来指称体育新闻报道中的某个明星。文章通过对大规模体育新闻语料的统计，发现这种指同表达方式主要存在于新闻双节标题和新闻正文中；在此基础上，文章具体研究了它的语篇分布特点和回指距离等问题；借助小范围的阅读理解测验，考察了影响新闻受众识解指同表达的一些因素，不仅与语篇回指距离的长短有关系，也跟指代对象的新闻曝光度相关；换言之，指代对象的见报频率往往影响这种指同表达的使用频率。论文最后尝试从体育新闻话语的性质来分析这种新的指同表达的出现原因和语用效果。